三辉书系 — 行路人



柬埔寨 旅人

《我的凉山兄弟》作者 刘绍华

以人类学眼光叙写惊心动魄的柬埔寨经验

高脚屋、吴哥窟、"送水节"、"堆尸陵"

一个充满惊喜与苦痛的世界

警察、妓女、乞讨者、台商、异乡人

一个饱受苦难的文明古国的当代生活

台湾《中国时报》年度开卷十大好书

版权信息

书名:柬埔寨旅人

作者:刘绍华

ISBN:9787511733399

本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授权中信联合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电子版制作与发行

新版序 移动作为生命的方法



摄影丨黄丁盛

旅人是种奇妙的生命角色。身体、眼光、情绪、智性与记忆跨越空间，在时间中穿梭，在人群间交流，各种形式的移动让旅行可以不只是出游，而是进入不一样的生命状态。第一次感知体验的当下，通常不是惊异得大声嚷嚷，就是震撼到静默沉淀。小孩第一次搭乘火车，成人第一次搭飞机，农民第一次光临大都会，都市人第一次脚踩田地，青少年第一次阅读穿越时光的小说，甚至婴儿第一次站立并以不同高度看世界，都是生命中各种移动带来的惊奇感受。

移动，一直是我们实际生活与完成生命的方式。太寻常，以至于经常忘记它的独特性；又太特别，以至于过度慎重以待而失却平常心。移动作为生命的方法，若能举重若轻，该是人生的善修为。

柬埔寨之旅是我生命中首次大跨度的移动。屈指数来，在柬埔寨的时空中称得上是“第一次”的移动实在很多，它们让我的生命、眼界与心房洞开：在异乡长期生活，见识普遍的赤贫，认识众多文盲，在漫长的烂路破桥上开车，看见这么多被地雷炸伤的身障者，知道这么多的艾滋患者生活在周遭，拜访以茅草竹片为墙的监狱，在这么多白

人的酒吧中与不同国籍的东南亚小姐打交道，见识台商“包二奶”是怎么回事，遇见远赴柬埔寨茶馆淘金梦灭的中国姑娘，和“黑道”打交道，在高脚屋里生活，挑河水洗澡，与这么多明明过得辛苦却总是微笑的高棉人相交。这么多的第一次，我若没有改变，不是悟性太低，就是固性太强。所幸，我虽非天才，亦非蠢才，中庸尚可，由里到外都改变了许多。

在不同的时间、空间、人群、文化、社会位置中移动而形成的眼光，让我得以在旅居柬埔寨的日子里认识异文化的世界，也体验出自己的可能与限制。于是，我也才有勇气在日后进行更大跨度、更为困难的移动，从柬埔寨到非洲到中国凉山。我心知肚明，如果没有柬埔寨的生命移动经验，不可能有我后来的凉山体验，我可能也没有能耐把一个动荡的故事尽可能心平气和地写出来。

这本书于2005年在台北出版，十余年后才要在中国大陆出版，主编要我写些多年来的变动想法。这世界瞬息万变，我也许久未曾重返柬埔寨，能写什么？面对十多年前自己的心情故事，今日的我也不想交出白卷，那就聊聊近年来看到的新兴现象，顺带让当年没写出来的回忆重见天日。

十余年过去了，柬埔寨乃至整个东南亚，从对东亚人而言似乎不是那么令人瞧得起的区域，已成为举足轻重的世界板块。东南亚的劳工、女性、文化、语言、饮食、电影、政治影响、市场规模、经济发展等，令身处东亚的我们无法再漠视邻近区域的人、事、物。台湾早已从过往的只朝北半球看，逐渐转向关注南半球。对于东南亚的关注，台湾最值得提及的民间努力之一是2006年创刊的《四方报》，这是一份以越南文、泰文、印尼文、菲律宾文、缅甸文、柬埔寨文为书写语言的月报。当年的创刊总编辑张正是我大学时期的学弟，他和副总编辑廖云章是夫妻，云章是我跑新闻时的同业好友。认识他们这么多年，不曾见他们改变其志，始终如一得令人感佩又安心。两人离开

《四方报》后，又开设台湾第一家东南亚主题的书店“灿烂时光”，甚至举办“移民工文学奖”，并将获奖文章翻译成中文，双语并列出版。他们为促进台湾认识东南亚与在台东南亚新移民所付出的努力，有目共睹。也许值得未来中国大陆的民间工作者参考。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如此真心善待东南亚，它主要被看重的还是当地的经济效益。在台湾，学习东南亚语言似乎已成大学毕业生的就业保障。台湾房地产投资客在自家炒房还不够，继买进破产的美国加州地产后，东南亚的房地产已成为热钱涌向的新目标。每天早晨我开车上班途中都听到收音机里传来“海外房地产投资首选，我推荐柬埔寨”之类的洗脑广告。台北街头更不乏见巨幅广告“金边房地产，投资报酬率7%”。中国大陆人也早已带着重金进入东南亚架设高铁与开辟经济特区，与之同去的还有夹带着中国式管理的文化特色。

从中国与美国两大经济体的竞争硝烟中，更可闻出东南亚的经济重要性。美国自从主导《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简称“TPP”）后，一直排除中国加入。2016年2月初，十二国签订协议时，美国总统奥巴马再度发表声明，表示：“TPP让美国，而不是像中国之类的国家，来书写21世纪之路的规则，这对亚太地区尤其重要。”而中国，也积极与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简称“东盟”）签订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简称“FTA”），密切往来。台媒即以“中美抢东盟如抢奥运金牌”来形容中国与美国在东盟中的激烈竞争。

两大经济体争相拉拢东南亚，以壮大各自在全球体系中的政治经济影响力，说明这个区域的重要性。但是，除了市场与经济价值外，有权有势者真心看到与珍惜东南亚的文化意义吗？还是，对东南亚文化的欣赏仍是以经济观点来评价？举例来说，泰国是个虔诚的小乘佛教社会，孝顺与敬老是社会美德，而这些美德并非西方社会所崇尚，

也在原以大乘佛教为主的东亚社会中逐渐式微。如今，在全球化的时代，货币交易与流通无国界，文化及承载文化的人作为商品也一样无远弗届。于是，东南亚劳工大量输出东亚照顾老人，西方白人则移居泰国退休养老，享受泰国服务者对老年人的亲近与贴心照护。经济因素伴随着文化特性，让东南亚的文化与劳工和外界交互移动得更为频繁。

另一种更常见的交互移动便是旅游。东南亚的货币相对而言仍是弱势货币，东亚旅客来此消费十分划算。可能正因如此，许多东亚华人旅客，即使是年轻人，到柬埔寨旅游亦常住进高级观光饭店，享受在自己国家或去发达国家旅游时难得的消费活动；俨然从东亚向东南亚移动的过程中，自己的社会经济位阶倏忽由下而上。殊不知，如此不察地跻身全球性的社会经济位阶排序，仍停留于原本的世界想象与向往秩序，可能会错失了解当地文化与生活方式的机会，无缘探索不同层面的移动惊喜。最终返程回家时，才由高处落地回到现实，马车变回南瓜，全靠照片来追忆海市蜃楼般的华美。如果年轻时期就如此依照社会经济体系的阶序筑梦，而缺少认识差异的真心与体验尝试，年轻人最担忧的不平等未来，能有机会改变吗？

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年轻时代都对世界心生向往，对改变世界的不公不义有过自我期许。但实际投入行动的，可能只是少数。诚然，对于行动的定义可能因人而异，但不论如何界定，我想关注与理解应是所有行动的基本出发点。在经济荣景之外的东南亚其他面向，也值得我们关注，如同我们希望自身面临的结构性不平等与改变未来的可能性也被世界关注一般。我们自身和东南亚，在全球架构下其实一体相连，都被卷入也积极参与了那个无以名之、却无所不在的全球化影响。

东南亚至今仍是个悲苦与希望并存的世界。当然，东南亚之大，很难概括讨论，就谈柬埔寨，这是东南亚最困难的国家之一。光从政

治上，就可以理解这个国家的辛苦。我在2005年出版的《柬埔寨旅人》中写道："洪森曾是世上最年轻的首相，年仅三十四岁便担任柬埔寨的首相兼外长，并连任三届首相，任期近二十年……很有希望超过印尼的苏哈托，成为掌权最久的国家领导人。"如今2016年，他依然统领柬埔寨，政治权力无人可及。古今中外的历史从无例外，由一家专断政治的时代绝无可能万万岁，我引颈期待柬埔寨的未来。只是，在全球经济架构中奋起直追的柬埔寨中上阶层准备好接受秩序变动了吗？他们愿意为了长远的子孙未来而挑战既得利益的架构吗？汲汲忙于生存的柬埔寨中下阶层能有心力望向远方吗？这个让亚洲热钱躁动涌进的国家，2016年的国民人均产值其实不过一千美元出头而已，换算起来，平均每日不到三美元。柬埔寨的乡间仍埋藏着无数不明下落的地雷，号称经济起飞的首都金边周围仍充斥着以捡拾垃圾维生的贫民，众多的艾滋患者缺乏生机。天堂与地狱的写实，就如同吴哥窟的石雕故事一般，上演着人世历史中的喜怒哀乐、罪与罚、堕落与超脱。

这些写实所透露出的光怪陆离，我在书中写过，如今景况应该更具张力。不过，有一则故事我未曾写入。沧海桑田，如今提笔，应该已无伤于人。台湾著名的黑社会组织"竹联帮"出过一位传奇领袖陈启礼，我在柬埔寨工作期间，曾受惠于他的协助。长话短说，一名台商占用了我们工作站的车子，我无计可施，转向一名在柬埔寨辟地耕稻的台湾媒体前辈求援。该名前辈告诉我只有陈启礼能治这类台商，但他也说像我们这种从事国际援助的民间组织是"白道"，而陈是"黑道"，"白道"不方便直通"黑道"，所以由他帮我去说。没几日，车子就还回了。这真是帮了我一个大忙。我自然明白黑白两道分流的道理，但事后陈托人转达邀请我们去他家时，我仍欣然携礼上门致谢。陈启礼很明白地说，他非常佩服我们在柬埔寨的工作，有任何需要可以直接找他，也欢迎我们随时去他家玩，包括使用他家的游泳池。他对我们的善意，就像许多台商对我们的诚意一样，表现出与寻常台湾人往来的乡愁。

但我在柬埔寨期间没再上门过。世事难料，我最后一次拜访陈启礼的金边住家，竟是我离开柬埔寨之后的事了。离开柬埔寨后，我回台担任记者。2000年6月，柬埔寨台商会长遭人杀害。这搅动了台湾与柬埔寨的政治经济神经，各种传言四起。我被报社派去金边采访此条新闻，众多的台湾媒体，尤其是无线电视台也出动不少摄影机。一大群台湾媒体在金边采访，语言不通，文化与政治差异悬殊，但台湾电子媒体在异地仍惯常采用台式采访风格，见到柬埔寨检警出来，便蜂拥而上，以麦克风撞向人脸，然后七嘴八舌提问，有人甚至用中文，没错，用中文询问。该名检警脸色大变，旁边的警察愤而拿起真枪实弹的步枪，一副你再闹我就上膛的架式。台湾的警察卸枪弱化与民为善已有时日，台湾媒体在自家当老大惯了，总之，那群台湾媒体人出于惯性与无知，没在怕的样子。但柬埔寨可不是民主国家，那些军警的怒脸在我眼里真是令人胆战心惊。我马上趋前采用柬式礼仪，使用尚可沟通的高棉语跟那些荷枪实弹的军警道歉，并拜托台湾媒体赶快离开。本来那些大无畏的台湾记者似乎还不想撤，直到我说："你们再不走，到时他就算不抓你，也会没收你的摄影机。"勇敢的台湾媒体才悻然退离。

该名台商会长被杀的新闻，在此不赘言，总之是件复杂的商人内斗。欠缺当地消息渠道的台湾媒体大多无计可施，只能等待柬埔寨警方的消息。记者出差在外，没有新闻传回，不好交差。于是，有媒体提议去采访陈启礼的住家。说也奇怪，向来甚少接受媒体访问的陈启礼，居然毫无犹豫地敞开大门亲自迎接像观光团一般的台湾媒体，带领大家参观住处，而且几乎有问必答。可能是气氛太好了，突然，一名无线电视台的菜鸟女记者要求参观陈启礼的"军火库"。听到这请求，我很讶异，没想到陈启礼居然立刻微笑答应。我还记得，在爬楼梯往目标移动时，我走在人群后面，和陈启礼当时身边最亲近的小兄弟在一起。这小兄弟一向寡言但对陈十足忠诚，我低声问他："给这么多人看枪支，这样好吗？"小兄弟难得地回我话："不好！"然后面色凝重地看着前方簇拥的人群。

我当时的感想是，陈启礼就算仍是江湖大哥，也老了，想家了，他八成想与媒体亲善，看看能否增加他获准返台探望老母的机会。只是，人算不如天算，将军难免中箭落马。菜鸟记者的提议配上老大哥的失算，陈启礼的愿望永远落空。该家台湾无线电视台的新闻在柬埔寨也能够通过卫星收看，隔天，陈启礼家中藏有军火的新闻画面传遍柬埔寨，不论陈启礼当时与柬埔寨高层有何瓜葛，光是他以军火示人，公开挑战柬埔寨政府权威，就足以让他倒台，他立刻被柬埔寨武装警力抓入大牢。

因为台商会长被杀而涌入金边的台湾记者，马上把焦点转向“竹联帮”大哥陈启礼在金边遭逮捕的大新闻，忙得人仰马翻。我清楚地记得，当陈启礼从警局出来被带进车子坐在左方后座时，我就站在车子旁边，他认出我，双手被扣住的他自然也没权利打开车窗。他贴着车窗对我用唇语说：“帮我找律师。”我愣在那里，心里五味杂陈。我是个客观中立的记者，也曾是受惠于他的民间组织工作者，我能接招吗？我有何能耐接招？更令我困惑的是，他怎么会找我呢？他已经无路可走、病急乱投医了吗？显然是的。

陈启礼终究未能以活虎之姿离开柬埔寨，2007年病重，赴香港就医未果逝世。当年遗体返台火化，丧礼惊人地隆重，治丧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就是当时台湾“立法院”院长王金平。我曾经守着那条“白道”“黑道”界线的谨小慎微，在看到新闻的那一瞬间，就对照着现实的台湾政经戏台，成为我心中自嘲的笑话。

这段往事，为我的柬埔寨经验下了适切的注脚：我对移动可能造就的善与不善，体验深刻。人情冷暖与世事道理并非黑白分明，但贫穷与炫富、不堪与光彩、期望与梦碎却常写实得令人疼痛。台湾或其他地方华人对异文化的无知与不尊重，也常令人瞠目结舌。

我在柬埔寨时以住民自居，回首往事时则成为旅人。回忆在不同的时空与观点中交错成型，记载了我的一段生命纪事。

人类学于我，是一种生命眼光，远胜于一类学术语言。但我对人类学精髓的衷心体悟，是在柬埔寨开花，“后柬埔寨时期”才陆续结果，《柬埔寨旅人》与《我的凉山兄弟》都是受惠于柬埔寨移动经验的花果。从柬埔寨到凉山，我以不同姿态尝试探索这个世界，以脚跨越，用心理解，借文字表意。我有幸看到的这个世界，充满了苦痛与惊喜，滋养了我，让曾经年轻困惑的心，逐渐眊智升华。一笑遣人事，这本事，我似乎靠近了些。

书写是我理解这个世界与介入不平的方式。只希望不是发泄自我的主观与情绪，而期待记录自己理解差异后的感想与反省，才不负我曾大言不惭地说过：“人类学活在我的眼睛与血管里。”

刘绍华

2016

序一 惊心动魄的旅行叙事

提到柬埔寨，台湾人大概会想到令人发思古幽情的佛教圣地——吴哥窟或当初“红色高棉”留下的成千上万的骷髅头，在脑海中浮现政治暴力、军事镇压、盗匪横行的景象。大致上，台湾对柬埔寨的了解，一个途径是旅游手册上的介绍，另一个即是大哥级“立委”在当地帮助台商的事迹，很少人像刘绍华这样蹲点深入柬埔寨的城市，在巴萨河西边的村子住下，不仅洗衣，连刷牙、洗脸都靠山吃水，以她担任“台北海外和平服务团”（TOPS）的特派员身份，历经两年光阴，发展其近乎“土著”的观点。

绍华笔下的Koh Thom村里的人物（如Imm、房东等）、高脚屋、巴萨河畔的夕阳、湄公河卖青箭口香糖的小女孩、金边城市的奇景及她所观察到的种种文化差异，像人类学家的民族志（ethnography），更像惊心动魄的报道文学或旅行叙事，充满了风俗、训练、环境、警察、女性、外国人、风雨、罪恶、博物馆、寡妇岛、农村、难民营，乃至触目惊心的饥饿、疾病及受骗的感觉。从当地人安之若素露出的神秘微笑，到古老之文化祭典与艺术，都充满了惊喜。而且绍华不断拿这些场景与台湾做对照，由卖口香糖的小女孩到椰子保温杯，或她自己有关艾滋病的调查及教育工作，为当地人讲授台湾原住民之文化等，都具比较文化、社会、宗教之意义。

绍华马不停蹄，一路看到柬埔寨如何跌跌撞撞走向全球化的文化经济。在这个过程中，她不仅从都会发展、技术、通信上看到一些美丽的“非现代性”残存，而且在金边见证了人口贩子拐卖农村少女、逼迫善良人家弃贫从娼的各种“慢性病”及社会伦理问题。在她的心目中，佛教精义也许是一丝希望，或可保住当地优美的温厚与善意。

这本小书是由十一个民族志所集成，最能引起台湾读者兴趣的应属《失梦园》这一章，因为它谈到台商去柬埔寨的经历及其兴衰。读到1997年以后，台商定居柬埔寨的第一步是自备手枪，雇用保镖，并随时保持低调，准备赔钱，真教人觉得在外的台胞既孤苦又危险重重，但这种草莽行径，谁令致之？大概有相当大成分是台湾人对南亚或外面的世界缺乏正确的认知吧。

绍华的书因此开启了了解南亚文化的一扇门，让读者进一步透过她所看到的农村、妇女、历史、仪式、台商、军警，去观照亚洲其他地区已碰过或正遭遇到的问题。

绍华是我在台湾"清华大学"人类学所联合指导的学生，记得她喜欢十分另类的文化人类学，她修成硕士正果之后，又跑去澳大利亚深造，同时也在韩国、中国大陆做田野调查，是研究生中最具泛亚洲文化经验及视野的人，不但勇于尝试新领域，又肯冒生命之危险去帮助罹患慢性病或艾滋病的农村妇女，她的学识、热情、诚恳是极其少见的。2001年我到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有一天居然收到她的E-mail，原来她在哥伦比亚大学修医学人类学之博士学位，正做亚洲与中国艾滋病患方面之田野工作，令人对她的活力与菩萨心肠大为感佩。最近，她将书的初稿交给我，读了之后更觉得她的柬埔寨经历令人耳目一新，值得大家借镜。

廖炳惠

2005年4月4日于新竹风城

序二 仪式尚未完成——我的柬埔寨记忆

1998年，我终于有机会前往向往已久的东南亚工作。当时我还在香港《明报》担任驻台特派记者，1998年柬埔寨第二次民主大选后一周，我抽空去了这个旧称“高棉”的国家观察一趟，并决定了我未来两年在柬埔寨的工作计划。就这样，我离开了上山下海、跑遍全台的有趣记者工作，接受了每月津贴只有我原来工作四分之一的条件，提着一个皮箱来到了柬埔寨，加入了“台北海外和平服务团”柬埔寨工作队。当时，服务团有三个计划，一个是教育月刊计划，另一是游民职训计划，而我接手的战后小学教育重建计划是唯一常驻乡村的计划站。能接手这计划令我雀跃，读人类学的我，很期待深入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在此之前，我也有机会选择服务团位于泰缅边境甲良人难民营（Karen refugees）的计划，但我更想见证一个快速变化的社会，所以选择了柬埔寨，而不是去泰北难民营。这一决定，改变了我后来的生活路线。

我自台湾“清华大学”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毕业后，对东南亚研究非常有兴趣，1996年时曾想过报名东南亚研究的公费留学考。当时的我对东南亚的了解近乎于零，为了准备考试我觉得必须阅读中文书，不然考试时连地名都不会写怎么办。所以我跑了台湾“国家图书馆”、台湾分馆以及各大书店寻找东南亚研究方面的中文书籍，结果发现我找得到的书籍所写的历史都终止于20世纪70年代，那正是东南亚面临剧变的年代，但之后那块区域的发展轨迹，在当时的中文书架上一片空白。现在，台湾的东南亚研究已陆续展开，而坊间也出版了不少东南亚的旅游类图书，但多是翻译书籍，少有台湾作者撰写的非学术研究的深入报道。

人类学活在我的眼睛与血管里，我在柬埔寨期间就有撰写田野杂记寄给台湾友人的习惯。2000年，我对所谓的第三世界国际发展的疑问大到无法以我当时既有的知识解套，决定继续我的人类学梦想，并期待圆梦的同时，我的困惑能得到解答。所以我离开了柬埔寨的第二个工作，就是在金边的高等研究院人类学艾滋病研究计划的实习工作，带了三只皮箱回到台湾，装满了一堆历史、发展与艾滋病研究资料，当然还有一些我喜爱的柬埔寨工艺品。只是，有限的行李箱，满满的记忆装也装不完。

回台后，我立刻投入工作并准备赴美专攻医学人类学，柬埔寨的一切迅速且无奈地遭到搁置。回忆被搁置的期间，我经历了一段不短的混乱状态。后来，我自己和友人都发现，我之所以如此混乱，是因为我还留在柬埔寨的田野里。我还没走出来，仪式尚未完成。

在我行将前往中国凉山展开研究之际，我终于写出了我的柬埔寨记忆。仪式一搁就是四年，我终于出关了，总算能够腾出心力前往另一个地方，经历另一段长时间的生命了。

回头冥想那段岁月，撩起本已遗忘的情绪，虽不复当年强烈，依旧令我一阵恍惚。

这部尘封多年的纪录影片，没能按时间顺序放映，老旧的东西特别有自己的逻辑，喜欢在不同的空间里寻找痕迹。时间，已没多大意义，终究，过去都属于过去。过往不尽然都是一径喟叹，生命嗜调自己的滋味，即使在最忧伤的时刻，也能挤出一脸苦笑；开怀大笑之际，也不弃忘人世辛酸。节奏有它自己的姿态，即使年纪未老也需要缓慢，历经沧桑也仍有激动时分。就看记忆先从哪格胶卷跳出吧！

刘绍华

2005

巴萨河畔

我就像是童话故事里的“吹笛手”，

当我的笛音响起，小朋友们就会尾随成一列上学去了。



摄影丨黄丁盛

我怀念那间河畔的高脚屋。

在巴萨河（Bassac River）畔，二层木板建造的高脚屋，楼上有个小房间，地板缝隙很大会进光，往下望能看见小管家Imm在扫地、小孩跑来跑去，那间原是加盖给管家住的房间，我在那里住了近一年。选择那个房间，是因为河边的晨光夕阳都进得来，我喜欢光亮。只是，每天换衣服时，都得低头留心有没有人正好从地板下经过，偶尔一只鸡溜达觅食路过，也会让我吓一跳。

每天清晨，我揭开隔离疟蚊、登革热蚊的挂帐，借着晃动的烛光，拉开客厅地板上一块防盗木板，然后走下通往厨房的楼梯，打开栓上的双扇木门，迎着河面吹来的晨风，打个哆嗦，开始费力地从沉重的饮用水罐中倒出足够水量，走出屋后，站在木板搭建的小阳台上，对着河面刷牙。

这里是距金边南方五十七公里远的干丹省Koh Thom县，Koh Thom意为大岛，是由巴萨河围出的一块行政区。巴萨河是湄公河（Mekong River）和洞里萨湖（Tonle Sap）汇集后再分出的支流，是条深绿色的大河，从我屋后看有几十公尺宽。刷完牙，再从水缸中舀出一盆水洗脸，水面上漂着昆虫和树枝浮叶，都是从河里打水上来时一并挑起的杂物，为避免把这些浮游物泼到脸上的拨水过程，就会让我不得不清醒了。

通常Imm这时也起来了，然后我们各自开始准备早餐。我们的习惯不同，我最爱水煮鸭蛋和马铃薯，再加一粒总是酸得让我皱眉的柳橙。乡下买不到鸡蛋，因为都被搜购到金边市里去了。城里人不吃鸭蛋，真是可惜，沾上粗盐椒粒的鸭蛋黄，特别有滋味。Imm的早餐很奇怪，她常一早就吃邻居大院树上掉下来的土芭乐，我吃过一次，涩得无法入口，但Imm总是边吃边笑，我真不懂这个当年只有十八岁的女孩。

第一次见到Imm，是我初到这乡下工作站的第一天，车子进入乡间烂泥小径没多久，我就看到她站在这间高脚木屋楼上前台，领路的当地工作人员介绍说是从村里找来帮忙的小管家。白白秀气的Imm看来有华人血统，穿了条橘色与咖啡色的大花纱笼裙，不笑，嘣着一张嘴，眼睛顽固地不知在看什么，我觉得她看起来挺有意思的，不像我接触过的其他柬埔寨女子，总是对外国人笑盈盈，那些笑容中掺杂了讨好。所以第一眼，我就对Imm有好感。只不过，她的倔强还真是贯彻始终。后来发现，我其实是找了个看家的而非管家，她不会煮饭，

成天在泥土地上扫那永远不会无尘可扫的地，第一次透过身形矮小的男助理Kosal翻译，拜托她把丢弃在河边的各式垃圾清理干净，并停止把塑料袋丢到河里时，被她白了一眼，回嘴说村里人都这样做，不丢河里丢哪里？待我受不了自己下河去捡垃圾时，邻人围观，她才来帮我清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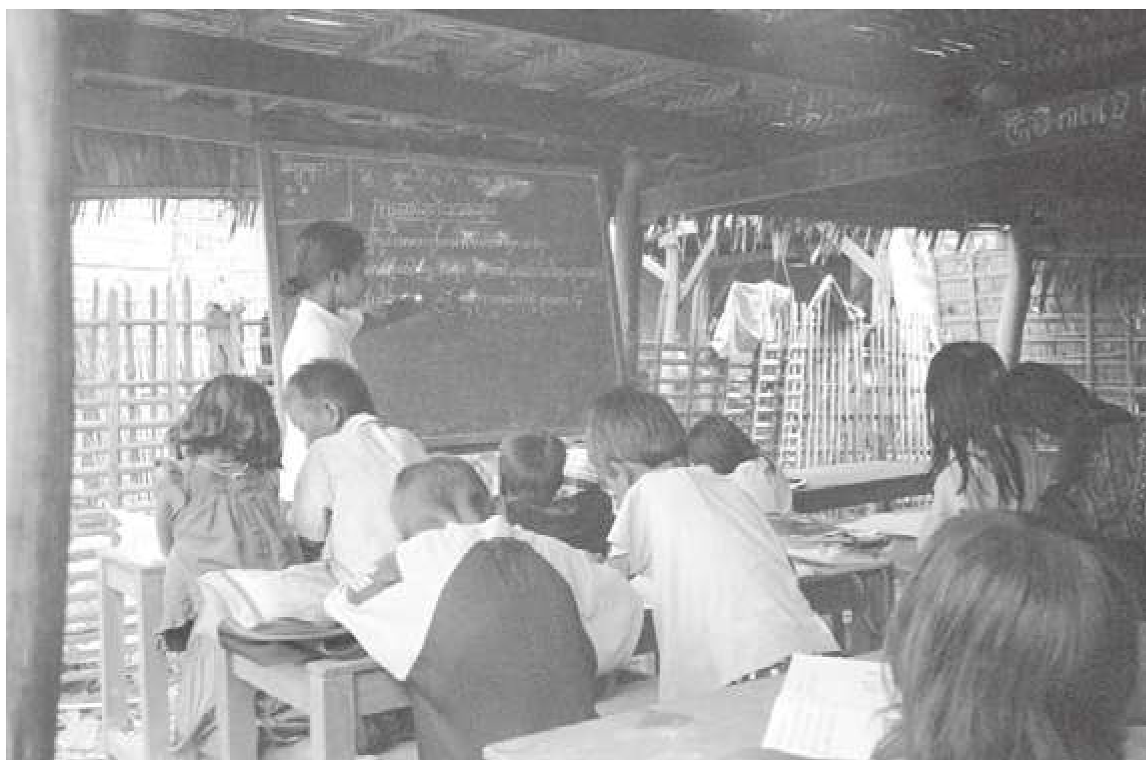
我工作的地点涵盖Koh Thom地区的所有小学，工作基本上是担任服务团与柬埔寨教育部、国际组织及学校之间针对计划相关事务的协调工作，有时也担任培训训练员（the trainer of trainers）的工作，主要的计划内容包括：提供当地六个资源学区共三十五所小学的校舍整建、规划教材及教具工作坊、培训师资及教育行政人员。战后学校教育重建的重要性，可从师资贫乏的严重性看出。根据联合国1991年的统计，波尔布特（Pol Pot）统治期间，焚书坑儒，学校教育终止，1979年红色高棉（Khmer Rouge）时代终结时，全柬埔寨各地仅剩不到三百名的合格教师。



摄影丨刘绍华

Koh Thom地区的学龄儿童有二万六千多名，但为数不少的小孩家境困难无法就学，因此，我的工作计划还包括赞助该区四百名六至十五岁因家贫而无法读书的孩童上学。很多朋友都以为我是去柬埔寨当小学老师，真是美妙的误会。即使我后来陆续学会了柬埔寨话，但对那源于印度梵文、舞动优美的柬埔寨文字我是全然没辙，我才需要去柬埔寨上小学学习说听读写哩！不过因为我的计划也包括赞助失学的小朋友读书，所以我曾开玩笑地和朋友们形容，我就像是童话故事里的“吹笛手”，当我的笛音响起，小朋友们就会尾随成一列上学去了。

Koh Thom最穷的区域在巴萨河的东岸，我所居住的村子在河西岸，交通较方便，以柬埔寨的标准而言并不算穷，但还是有不少穷人。和当地教育局官员商讨如何选择赞助失学儿童时，我们判断贫穷与否的标准，不是问有多少收入，在农村，现金收入不多。一般而言，Koh Thom穷人家的月收入在六万柬币（约合十五美元）以下，平均皆为三四万柬币，即不到十美元。我们采用的判断贫穷的标准包括：茅屋屋顶、没有耕牛、少于半亩农地、没有拖拉机、月收入低于三千柬币（不到一美元）等。最后从东岸二十一个村落中找出了四百名特别困难的小朋友作为资助对象。



摄影丨刘绍华

我的房东是柬埔寨教育部高官的亲戚，四周邻居也都是木屋，有些是平房，有些也是高脚屋，但都没有我这间高脚屋大。村落边区则有不少茅屋。村里人家都在屋外养鸡，有些也养猪，猪不是关在圈里，而是像小狗小猫一般，白天都在村里散步吃草，粉红色的小猪，热了就在水洼里打滚，看来日子挺逍遥。村里的公鸡很尽责，天亮之前肯定大鸣大放。不过，女人家起得比公鸡还早。

我的高脚屋非常靠近入村的烂泥路口，路旁左侧有间约两个榻榻米大的半高脚小屋盖在田边，离地面仅一米高，屋高则不到两米。说是小屋，其实只是一间鸽舍般大小的房间，一位自波尔布特时期便守寡的老婆婆独居在此，屋里挂满了拾荒而来的各式瓶罐器皿，村人有时会接济一些食物给她。每回走路经过这间小屋，都会闻到食物腐败的气味。周五回金边前，我会把未被老鼠啃尽的肥皂、食物清一清拿去给老婆婆。她没有门，只有一块破旧脏臭的大布帘遮着，每回掀开布帘，总见她蹲坐屋里喃喃念经。柬埔寨是个小乘佛教国家，念经礼

佛先于乐善布施，再穷的乡间都有佛寺、宝塔，有钱人在庙里广建浮屠，却不见出钱造桥铺路兴学。老婆婆总说菩萨会保佑我的好心。我不知道，她成天念佛，菩萨有保佑她吗?

村里没有自来水，都是接引或挑汲巴萨河水来用，洗澡、洗衣、饮水、戏水全靠这条大河。我大约两星期请人抽引一次河水，装在几个大水缸中，洒入明矾沉淀水质，再把水舀入狭小卫浴空间里的储水池，由于水池并不隐闭，所有的昆虫树叶都落得进来。每天傍晚前，我就是舀着一瓢瓢掺了杂物的河水，往晒得滚烫的身躯灌下冲凉。听说曾有个台湾义工不敢使用这漂浮着昆虫尸身的河水洗澡，到达的当晚便将所有的饮用水拿去洗澡用光，气得工作人员只好隔日便将她送走。

村里接有电线，但并非人人负担得起电费，多数人仍是用蜡烛、油灯。有钱人家可自用马达发电，马达动起来时可真是震天嘎响，全村都听得见。除了爱喝酒打屁的男人们偶而迟睡外，村民多早睡，夜间七时后便陆续熄灯熄火。初来乍到的当晚，我还不熟悉这间高脚屋，在入夜后的全然黑暗中踩空了最后一节木梯，扭伤了脚踝，第二天清晨，一拐一拐地在村里行走，在早市里和村民比手划脚为我的早餐做起买卖来了。我的名声很快传遍村里。也难怪，一个跛脚的外国人在农村，想隐姓埋名可不容易。

在路上遇到的老人家喜欢停下来和我说话，但我没一句听得懂，可他们总说得特别起劲，男人家多不和我说话，可能忌讳我的女子身份，女人家见着我总是吃吃笑着。我喜欢小朋友，尤其是那些成天盯着我看的小孩。我对门邻居院内有几株巨大的芭乐树，我常和小朋友一起打芭乐，只是打下来的芭乐我可不爱吃。

那个才刚会跑的小鬼头，自从我住进了这间高脚屋，他每天除了睡觉，就是在院里玩耍、盯着我的屋子看，只要见着我在看他，他就笑。我总是远远地和他打招呼，几天后，我想我们该是朋友了吧！就

走进他家，谁料他惊恐地哭号了起来，冲进屋里。他母亲半拖半哄地提着他出来，说了一些似乎对我颇为友善的话，但没有用，他继续哭。我耸耸肩，只好苦笑着离开。后来和友人提起这段挫折经历，他说你们亚洲人还好哩！他一个白人朋友在非洲工作时，还不用靠近，远远就可以把当地黑人小朋友吓得屁滚尿流。亚洲人外形上的相对不恐怖，我后来在马拉维与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时，的确领教到了，和白人比起来，黑人小朋友好像比较不怕我。

我自己煮饭，洗衣服，上乡间小路的早市买菜。我就是在这乡间变成素食者的。因为没有电冰箱，我早晨上市场买的肉，大热天的，傍晚回来后就发臭了，那味道令人作呕，把肉丢掉，然后Imm又捡起来煮了吃。不是Imm太俭省，而是她觉得我太浪费，当地人就是吃这样的肉。一两个星期下来，我就不再买肉了，后来吃菜就变成了习惯。我成天吃马铃薯、红萝卜和空心菜，吃到有一阵子红色素太多而皮肤发黄。

因为人力非常便宜，外国人甚少自己打点三餐，总会雇用管家煮饭。没多久，我的邻居开始觊觎那月薪四十美元的管家一职。我那依仗外国组织威风的助理Kosal，一有闲就到村民家吃香喝辣，吃人嘴软，终于某天来替对门邻居说项了。他说，Imm没用，不能替我煮饭、洗衣，而且手脚不干净，如果是我的邻居来做管家，会把我伺候得很好。我听了，心里大怒，但装作没事。我说，不是Imm不勤快，而是我喜欢吃自己煮的饭。还有，我都不知道Imm手脚不干净，他们不住这屋子怎么会知道？而且，Imm是个小姑娘，还没出嫁哩！把她辞了，以后她在村里怎么做人。我反问，在柬埔寨乡下，一个人的名声是不是很重要啊？说得Kosal不得不在嘴上也替Imm说说话，尽管他难以掩饰未尽其功的不悦脸色。

这些传言不知如何传到Imm耳中。某天一早，我正对着大河刷牙吃饭，她气呼呼地说了一堆话，我完全搞不清状况，只好敲Kosal的房

门把他叫起翻译，他显然前夜又是和村里的男人混在一起喝到很晚才回来，酒气浓重。通过翻译，我才知Imm是在抗议说自己没有手脚不干净，我不知Kosal翻译是否尽实，但在我说了我没相信别人的话后，Imm笑了。这个小姑娘，有个性，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当晚，我拿着柬文课本和字典，拼凑着字眼问她想不想继续读书。她在家里也没事做，如果有兴趣，我帮她出学费让她再去村里唯一的小学读书写字，我们也不用总是比手画脚、画图沟通，还是分不清指的是鹅还是鸭。她回说才不要去学校和小鬼头混在一起。Imm的反应，让我日后在Neak Leoung开办村里非正式教学时，意识到得把十四岁以上的大女孩和小女孩分开授课。她们觉得自己是女人了。

柬埔寨的女子，从小就穿裙、爱美，和很多所谓落后地区的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一样，再穷的女孩和女人也会带着耳环或其他饰物。我常常在一贫如洗的乡村看到光着上身、下着长裙的小小女孩，挂着鼻涕，脏兮兮的耳上吊着漂亮坠子。柬埔寨汇合了吉蔑（高棉人之古称）、中国、南洋、暹罗、印度等区域的血统与文化影响，各方交集的地理位置注定了这个国家的崛起与衰落，佛教和印度教在此折冲，创造出世界七大奇景之一的吴哥窟（Angkor Wat）。印度教的影响尤其表现在艺术、舞蹈方面，柬埔寨女子跳起舞来就像印度教画中的婀娜仙女。但在崇尚美白的亚洲世界里，一般而言，肤色较深的柬埔寨女子，在亚洲的性（别）交易上可不讨好。



摄影丨刘绍华

金边北方边陲地带有一块极其破败、供当地男人消费的红灯区，一条荒废的铁轨隔离出柬埔寨区和越南区。同样处于社会底层，柬埔寨区的收费更低一些，1999年时的价钱，一次性交易不到台币十元，原因就是柬埔寨女子较越南女子黝黑。在亚洲新娘输出的市场上，柬埔寨新娘的收费也最低。在台湾大量引入越南和中国大陆新娘之前，柬埔寨新娘一度涌入台湾，只是很多被人口贩子骗入地下性产业。这种现象，导致柬埔寨强人首相洪森（Hun Sen）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就公开禁止柬埔寨新娘嫁到台湾，并抨击台湾的人口贩卖行为。因为洪森的禁止，加上台湾婚姻中介业者也将重心转移到越南、中国大陆等地，柬埔寨新娘人数在台湾的确锐减。

只是我从没料到，Imm居然也被卷入嫁到台湾的风潮中。对于此事的无能为力，是我在柬埔寨经历的第一次伤痛。

在柬埔寨待了半年多后，年过九旬的奶奶跌倒住进加护病房，状况危急，我接到电话后当即赶回台湾。半个月后，我回到Koh Thom乡下，愕然发现高脚屋上锁，一开门，屋内的积尘告诉我许久未有人住了。终于找到Imm的家中，Imm的母亲说她嫁到台湾去了。晴天霹雳！问Imm嫁到台湾哪里？有没有电话？她母亲拿出一张皱巴巴的、撕了一半的纸张，说上面写了Imm在台湾的电话号码。拿过一看，心凉了大半截。乡下人没打过电话，不知道那所谓的电话号码根本就是金边的区域号码。我后来试着找当地人帮我打过去问，对方全然否认有在办理婚姻中介，一问三不知。我又回到乡下找Imm的母亲，她交给我一张模糊不清的台湾男子身份证复印件，只能辨认出该男子的长相和居住市区。那名男子，吊着眼，看起来有些身心障碍，住在高雄楠梓区，除此之外，我全然找不到其他信息了。Imm的母亲说她们收了五百美元的聘金。不知她说的是否属实，但我至此已全然心死。

一想到像Imm那样个性的女孩嫁到台湾，就让我很难再继续待在那间高脚屋里。后来陆陆续续发生的一些事件，让我开始调整在Koh Thom的计划，我终于不再回到那间高脚屋。

Imm离开后某天，Kosal告诉我河里捞出一具尸体，原来是河对岸的村中，某寡妇人家住在法国的亲戚寄来一笔钱，听说不过一两百美元，但在贫穷的乡间可是一笔大财，寡妇情夫为此杀人，还把尸体装在麻袋中并绑上大石头沉入河底，没想到尸体在河底漂流了几天，居然还是浮上水面，就在我的厨房可看见之处被人发现。我不记得该寡妇的小女儿怎么了，只是从此，我对着河面刷牙吃饭的兴致蒙上了一层阴影。

1998—1999年的雨季特别冷，冷到只有二十几摄氏度，报上说低于二十五摄氏度时就有可能冻死人。在这一年四季如夏的热带国家，乡下人成天打赤膊，很少有外套、厚毯，住在破败的茅屋中，二十五度冻死人不无可能。我也没有保暖衣物。某晚河面刮上来的飕飕冷

风，从地板缝隙中吹上我只铺着一张草席的床板，又想到那被扔到河里的寡妇尸体，我冷得背脊发凉，一夜无眠。第二天回到金边，连发了四天高烧，这是我这辈子发烧最高最久的一次。

又隔了一阵子我才回到乡下，没料到房东自作主张在高脚屋四周筑起水泥高墙与铁门，他的理由是这样对外国人比较安全。我气急败坏，简直不愿再跨进那屋里了。我不想在村中如此招摇，但是不少当地人总是把外国人捧得高高在上，主动讨好，而多数的外国人，尤其是法国人，的确要求或接受这种讨好。我住在这间围墙立起的高脚屋，相较于河对岸的贫穷状况，我的心里越来越不舒服。

就在我渐渐难以忍受发生在高脚屋周遭的事情时，服务团战后资源学区发展的三年计划正好告一段落。柬埔寨全国小学教育重建的做法，主要采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于拉丁美洲发展出的资源学区（Cluster）概念，由五六间小学组成一个资源学区，然后以中心点的小学为核心学校，主要的资源集中在此间学校，与其他卫星学校共享。这套制度原意是在邻近的学校与社区范围内，让有限的资源获得最大效益。但在腐败的国家里执行此一概念，无疑是在已够繁复的官僚体制中再加上一级。绝大多数的国际援助资源由中央开始分配，再到省、市、村落、核心学校、卫星学校、教师，最后才是学生。层层筛网的结果就是老师与学生能享受的资源已所剩无几。

我考量该村实际上虽已能自给自足，但腐败官员已收惯好处，越来越不成事，于是决定撤出这座村庄，在协助对该村有兴趣的其他外国组织抵达并开始调查后，我便开始寻找其他合宜且能施力的地点展开新计划。

就这样，我离开了Koh Thom的这间高脚屋，体验深刻。来到柬埔寨这个前法国殖民地，面对的不止牧歌式的异国情调，这里有深到历史骨里的悲苦落后。我不曾后悔离开那个村子，但我真的怀念那间高

脚屋，那巴萨河畔的夕阳，还有那机关枪一般的蜥蜴叫声，曾伴我烛光下写家书的形单影只。

季风雨

我很少看到柬埔寨人下雨撑伞，要淋则淋，不然躲一阵也不碍事，

至多用红红绿绿的高棉巾裹住头，该做的事继续在雨中做。

打伞，多麻烦，在柬埔寨那是和尚才做的事。



摄影丨黄丁盛

这个国家的平坦，让来自台湾喜爱登山的我，眼睛有些寂寞。柬埔寨以平原为主，和其他中南半岛的国家不同，无山脉南北纵行，仅有东北部与老挝、越南接壤处有丘陵地。无障碍的地形注定了易受外力侵袭的命运。气候分干雨二季，西南面临泰国湾（Gulf of

ailandd），境内河湖密布，热带地区的季风雨（Monsoon）来临时，整个国家大半泡在水里。

自5月到11月的西南季风雨季期间，那说来就来的狂风疾雨，每天必定造访个一时三刻。不似梅雨绵绵腻腻，季风雨干脆利落，来去倏忽。我很少看到柬埔寨人下雨撑伞，要淋则淋，不然躲一阵也不碍事，至多用红红绿绿的高棉巾裹住头，该做的事继续在雨中做。打伞，多麻烦，在柬埔寨那是和尚才做的事。

柬埔寨没有地震、台风，最大的自然灾害是季风雨带来的水患。雨季期间，许多乡间田野顿成水乡泽国，原本已是行路难的泥路更加寸步难行，轮胎陷在土里车子动弹不得是家常便饭。乡间许多村子一到雨季便成孤岛，田间成水塘，得靠小舟渡过。但并非人人负担得起频繁的行舟费用。孩童无法上学，老师无法到校。我后来工作的地点在湄公河畔，附近一座村庄每到雨季孩童便休学，每半年的休学导致许多小孩隔年回校后程度跟不上，只好重读原来的年级。就这样，我碰过一些小朋友，一年级就读了三个回合。

因为贫穷，柬埔寨乡间一年级小学生的重读率高达四成以上，只有一半的小学毕业生能够进入中学就读。超高的重读率与辍学率导致只有千分之二十几的学生能够读完小学和中学。水患问题无疑使学习的困难更为雪上加霜。

不仅乡间有水患之苦，排水系统极差的首都金边景况也好不到哪里，大雨过后一片汪洋，汽车、三轮车、脚踏车、摩托车全都泡在水里，常见车夫推着抛锚的摩托车涉水回家。我也碰过这情形，水中推车真是费力狼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前的那条巷子最糟糕，逢雨必淹，在金边工作的外国人常讥笑那里的“发展”最落后。

古时候，雨季期间绝不会有任何军事活动，也无法下田干活，男子多在此时出家修行。小乘佛教是柬埔寨的国教，和泰国一样，传统

上许多男子会出家一段时日。季风雨深深影响了柬埔寨人的节庆和日常作息。

金边正好是柬埔寨境内三条大河的汇流处，王宫前方的大河往北是洞里萨河，往南则是巴萨河，过了日本桥（Japanese Friendship Bridge）对面的小岛则又是湄公河了。洞里萨河是一条奇特的河流，印象中也是世界上唯一一条会随季节改变流向的大河。11月至5月的非雨季期间，洞里萨河就像所有大河的支流一般，东南方向涌入湄公河。雨季期间，洞里萨河水位暴涨，水流则转向注入柬埔寨北方的洞里萨湖。洞里萨河水流转向期间，差不多正好是最盛大的送水节（Water Festival），来自全国各地的上百艘龙舟汇集至洞里萨河竞赛，全国各省的民众也纷纷涌入金边，替自己省份的比赛队伍加油。据称十分之一的柬埔寨人口都会来到金边观看送水节龙舟比赛。

季风雨之外的季节，11月到隔年3月的干冷季，是一年之中最舒爽的时节。雨季来临之前的4月是最令人烦躁不安的时候。潮湿郁闷的水气还未形成雨势，屋里坐着不动也汗湿全身。没有冷气，把自己停搁在电扇前完全无济于事，但遇上经常性的断电，没了风扇，看着户外静止不动的树叶更令人抓狂。那种除了冷气房里无处可逃的闷热，真是难以形容。难怪5月季风雨的强势造访，会令人手舞足蹈。小乘佛教的泼水节，就在闷热的4月，也许和我们的端午节有异曲同工之妙，洒水可以消暑解热除瘴气。

柬埔寨人亲水的天性让他们期盼雨季，下雨时分的柬埔寨最能展现其新鲜、纯朴的一面，美好的事物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冒出。小孩下雨时不喜待在家里，雨是他们最好的游戏。大雨倾盆而下，小朋友冲出家门戏水，用小手、用碗瓢盛接树枝、屋檐滴落的雨水，和老天爷一起浇水在自己和旁人身上。一群群小孩像小动物般相互依傍，在地上聊天，任雨落下，小小孩坐在吊床上晃呀晃，小小的脸孔望向天空，光是看着雨也笑得好开心。

只有那个湄公河上卖口香糖的小女孩，是我最苦涩的雨中记忆。

我第二个工作地点在金边东方波萝勉省的Neak Leoung，位于湄公河东岸。从金边东行至波萝勉，要跨越湄公河。河上无桥，只能靠渡船。你看过法国电影《情人》（L’amant）吗？男主角梁家辉在越南境内湄公河的渡船上遇见女主角珍·玛奇（Jane March）。这里的渡船就和那电影里的渡船一样，汽车直接开上去坐船过河。我非常喜欢从江心眺望壮阔的湄公河，那种豁然开朗是大陆国家才有的大河景致。只是，渡船上拥塞各式人马，紊杂脏乱，没有影片中的唯美浪漫。

连车带人渡河一趟约需台币一百元，所费不赀，因此来往的车辆多是国际组织用车、货车或前往越南的小包游览车。摩托车、自行车及行人更是摩肩擦踵。渡船口的市集充斥乞丐、小贩，卖的多是切块的水果（如凤梨、甘蔗）、装在冰桶里的汽水、甜甜圈般的面包，还有烤小鸟。气味杂陈。很多小贩都是孩童、女人。车子一停驶，小贩的脸就会贴满四面车窗，他们会敲打玻璃要你摇下窗户。若是表现出购买兴趣摇窗探头出去，原本不以你为对象的小贩也可能转向，不断敲打车窗叫卖直到渡船到岸、车子离去为止。渡口排队等船时，偶尔我会下车透气，但过了不多久，就会为逃离小贩的穷追不舍而回到车上。渡船靠岸时，船上行人蜂拥而下，然后摩托车、脚踏车和汽车陆续奔驰而去。上船时则相反，汽车一夫当关，然后是摩托车、脚踏车和行人鱼贯登船。

船上也有小贩兜售，最常见卖口香糖的小孩。他们卖的都是青箭口香糖，很甜，通常一包口香糖吃了一片就被我搁着，天热潮湿，不消多时，口香糖就会粘在包装纸上，有些恶心。所以我很少买口香糖。

但是那天我买了，在滂沱大雨中买了口香糖。

雨季的某天中午，在渡口等船过河时，下起倾盆大雨，干脆让雨刷休息，因为雨势大得怎么刷也没用。狼狈地上船后，我排在三列车阵的最左边，偌大的雨滴敲打车身的声响震得我意兴阑珊，这么大的雨什么事也做不了。不知道那小女孩敲了多久的车窗我才听见。有人敲窗，我直觉的反应是，有人卖东西，不要理会，但突然想到下这么大的雨能卖什么东西呢？仔细一看，是个瘦弱的小女孩，十一二岁吧！长发被雨淋得遮住脸庞，她的头低垂，我知道豆粒般大的雨点打在身上，很痛的。她的眼睛在雨中挣扎着努力张开，看着我。我也看着她，隔着雨水不断滑落的车窗，模糊不清。我看见她的左手一直向上举着，手上套着一个透明的塑胶袋，袋中的手指抓着一条不到十台币的青箭口香糖。

我犹豫了一会，没有买，除了对口香糖没兴趣外，窗子一旦摇下，车内肯定立即淹水。那个小女孩的左手继续向上举着。她淋得不能更透了，口香糖比她自己还重要。想到这，我于心不忍，终于把车窗摇下，递给她一张湿透的千元束币。当她慢慢地把口香糖隔着塑胶袋递给我时，我已分不清我脸上的雨水和泪水。我全身淋湿了，车子也浸水了，但那小女孩还在维护着那条口香糖。

恸的文化差异

失去痛感，理性寂寞。我没能克服痛的文化差异，悲恸始终存在。



摄影丨黄丁盛

我从来没有如此恐惧过，从脚底窜到头皮的恐惧，逃跑的勇气都没有，甚至连移动脚步引起的空气流动，都带来更多的恐惧感，黏附在我已毛发直竖的皮肤上。这充满怪异气味的空间里只有我一个活人。密密麻麻的黑白大头照片贴满墙壁，那些受尽折磨的亡者垂死前无助的眼神盯着我，从他们身上剥下的沾满血迹的衣服堆在玻璃橱窗里，墙上是用骷髅头和四肢骨拼凑而成的巨大柬埔寨地图。我虚弱无力，害怕得想哭。终于，一名白人男子走进来，我们对望了一眼，在彼此的眼里看到了惊吓与支持。突然，华裔柬人阿英姐跑进来大叫我

的名字，吓得我胆都要吐出来，我跑上前紧抓着阿英姐的手臂像找到浮木似的，没料到她一个突兀动作，让我全然崩溃。她，居然用右手食指头，伸进墙上骷髅头的眼窝中，然后又敲敲骷髅头的牙齿，嘴里还发出啧啧的声响，说："好可怕呀！"

金边市中心的波尔布特罪恶博物馆"堆尸陵"（Tuol Sleng）集人类的恐怖血腥于一处。本是一所三层楼校舍为主的中学，而今，整幢楼的教室堆满了当年受虐者的人骨。一间间隐晦的刑房摆着当年的刑床，床头上方，是当时躺在床上令人不忍卒睹的受虐者照片。床前地板上的斑斑血迹仍在，原来该是操场的空间变成坟场。这里没有一丁点不可怕的东西。不过，最令我头皮发麻的，并非那些人骨血迹，而是人的意念与精明——全表现在为虐杀而发展出来的种种匪夷所思的刑具上，我惊骇至极。离金边二十分钟车程远的郊区外，还有一处杀戮战场（Killing Fieid），那里的一座高塔，远远就见到玻璃窗内人骨拥塞，黄土堆下更是埋葬了无数冤魂。经历四年的恐怖统治，柬埔寨保留这些罪恶之地警惕世人。

光是"堆尸陵"一地，四年间就有两万人在此遭受拷问、折磨与处刑。魂魄杳冥，唯幸存近四千份受虐者自白档案，成为史学家见证虐杀的血泪文献。

我是硬着头皮走进罪恶博物馆的，只为了了解柬埔寨的过去。出来时，我觉得这辈子不可能再有勇气走进那里了。我以为，不再靠近那时空冻结的人间炼狱，就能把那恐惧悲恸丢到脑后。我错了！这个国家，历史的幽灵无所不在。

1999年风和日丽的某天上午，我到巴萨河中的一座小岛拜访日本义工友人。那里被称为"寡妇岛"，据说居民都是被安排迁居至此的寡妇及幼儿。岛上尽是破败的茅顶木屋，生活贫瘠。抵达的时候，朋友不在她暂居的荒废校舍里，村里的小孩兴致高昂地领着我去找她。一群衣不蔽体的小孩簇拥着我走在田埂上，阳光煦煦，很美丽的一天。

走着走着，看到田中央有一个破破烂烂的迷你小屋，我指着它问小朋友是什么，小孩们七嘴八舌地叫起来。我没听懂，他们拉扯着我的手，把我拖下了田埂向田间走去。到了小屋前，看清了，其实只是一间约两公尺高的四面木墙搭起的棚子，屋顶漏空，建在黄土堆上。小孩们示意我走上土堆往里看，我太矮了，看不到。他们又用肢体语言示意我爬墙，我照做，结果，惊吓得差点跌下来：棚里是堆叠满满的白森森人骨。见我惊恐得说不出话来，小孩们一个个在阳光下笑得灿烂得不得了。那些人骨也是屠杀的牺牲者。我后来在许多乡村田间也见到类似的棚子。

我开车下乡时，常见画着黑色骷髅头及“X”的标志，矮矮地倒立在田边路旁，那是警告地雷的标志。清除地雷的组织多属于加拿大和英国，他们就像军团一般，执行任务时着军装、住营帐。我的日本好友Higashi加入英国扫雷组织，我去吴哥窟所在的暹粒市（Siem Reap）找他时，他带我参观了地雷工作站及宿舍，像个兵工厂，雄性极了，我很不适应。

邻近金边的省份，地雷多已清除干净，而与泰国和越南交界的边区地带，仍是地雷密布。内战期间埋下的地雷，多到没人清楚。即使在金边所在的干丹省，部分地区地雷埋布情形仍不明了，所以我下乡时偶尔也会见到地雷标志。只是，我常看到当地小孩视若无睹地进入警戒区放牛。

这些小孩和阿英姐一样，他们不是不知苦痛。只是，生活在这样有着如此悲惨过去与艰苦现况的国家，他们对悲痛恐惧的感受和我不同。

恸，是一种文化差异。在柬埔寨，日复一日，我渐渐克服了这种文化冲击与差异。

第一次去Neak Leoung拜访后来成为邻居的“小水滴”（Goutte d’Eau）孤儿院，瑞士组织办的，瑞士籍工作人员Fabio说这里收容了二三十名来自柬埔寨各地不同年纪的流浪幼童。保姆和老师都是当地人，看到外人来访，一名妇女抱着个小婴儿走上前来打招呼，还有其他小孩也团团围着我们。原本兴高采烈的我，没料到看到的是一名缺手缺脚的小女婴，长得是人见人爱，但我惊惧于那小小的残缺人形景象；而其他小孩抢着拥抱这小婴儿，又亲又搂的，对于小婴儿的残缺似乎无人引以为意。我为自己感到汗颜，但无法掩饰视觉上的惊惧带给我的心理震撼。

突然间，泰缅边境甲良人（Karen）难民营里“短短”的影像闪过，那是一个天生残缺的小男孩，出生时就缺少膝盖以下。我见到他时，他年纪约八岁，穿着一双大雨鞋，身形看起来短一截，在难民营工作的服务团人员说他因而得名“短短”。虽然少了一只正常的腿，但见到“短短”时，他正在山坡的营区里奔跑，嘴巴笑得大开。“短短”的快乐让我异常温暖。想起“短短”，我终于克服了心理障碍，伸手拥抱了这只有小小躯干的婴儿。我还是会颤抖，只是愿意更靠近一些。

在柬埔寨生活久了以后，和当地人一样，我的耐痛度越来越高，甚至练就了漠然的本事。虽然，最漠然的常常是当地人。长居柬埔寨的外国人大多了解，有时，漠然是一种继续留在这个国家的生存之道。太多的情绪反应，很难待下去。漠然，像是一种必要之恶。

只是，人常是先走过螳臂挡车的荒谬阶段，重新度丈自己的能耐后，才逐渐走向漠然。

刚到柬埔寨时，我几乎天天在捐钱，虽然每次都只是台币三五元左右。老小乞丐、被地雷炸掉一条腿的年轻人、病人、游民存在于所有我经过的空间。我开始学会将一切看在眼里但不让自己情绪激动。渐渐地，看到断肢残臂的乞丐和流浪的小孩，我也不再给钱。我发展了一套自我逻辑，给食物，不给钱。看到村民修道路，给钱。只是，

后来发现，很多时候，给的其实是村民勒索的过路费。最后，我得到结论：不解决结构性的暴力，个人的施舍无法救这样一个国家。我以为自己认清了天经地义的残酷事实。

我只对了一半。错的那一半，差点让我忘却了恸是珍稀的人性感受。不止是我，我也看着朋友在挣扎，在消减痛的文化差异与慈悲之间挣扎。

那天晚上，印度好友Mack开着他的无门吉普车送我回家时，在转角巷子口，见到一个小女孩坐在路旁啜泣，她手上拿着一个洗脸盆。已是晚上十点了，金边入夜后的治安很差，我们绝少夜间还在路上行走，遑论停留，小女孩独自一人在那哭泣，情况不寻常。Mack有着见不得人哭的好心肠，他问我怎么办。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要我也下车去和小女孩说话，因为他不会说柬语。Mack和众多他的联合国同僚一样，从来不学柬语。

小女孩说她乞讨了一天的钱被强盗抢走了，没有收入她不敢回家，会被打，又哭得唏里哗啦。问她乞讨了多少钱，她说的数字超过五美元。Mack虽伸手掏腰包，但还是问我觉得如何。我开始理性分析，以柬埔寨人的收入，一天乞讨收入五美元，太多了。在乞丐充斥的金边市，我想象，这样一个小女孩，不太可能有如此斩获。

Mack也有些怀疑，但他无法掉头就走，他说只有五美元，就给个心安吧！好心的Mack同时招来一辆摩托计程车（Motordok），付了车资，要骑士送小女孩回家。望着小女孩离去的背影，Mack还担心摩托车骑士会抢了小女孩的钱。我们也各有所思地回家了。

金边的某些外国人，尤其欧美人，喜欢搞文艺活动，像是戏剧、诗歌朗读会等。苏格兰友人Jane尤其活跃，专长戏剧导演。一天，Jane办了个诗歌朗诵会，她知道我偶尔写诗，邀我参加。我不好意思拿自己的呓语献丑，选了一首隐地的诗《寂寞方程式》，和曾在天津留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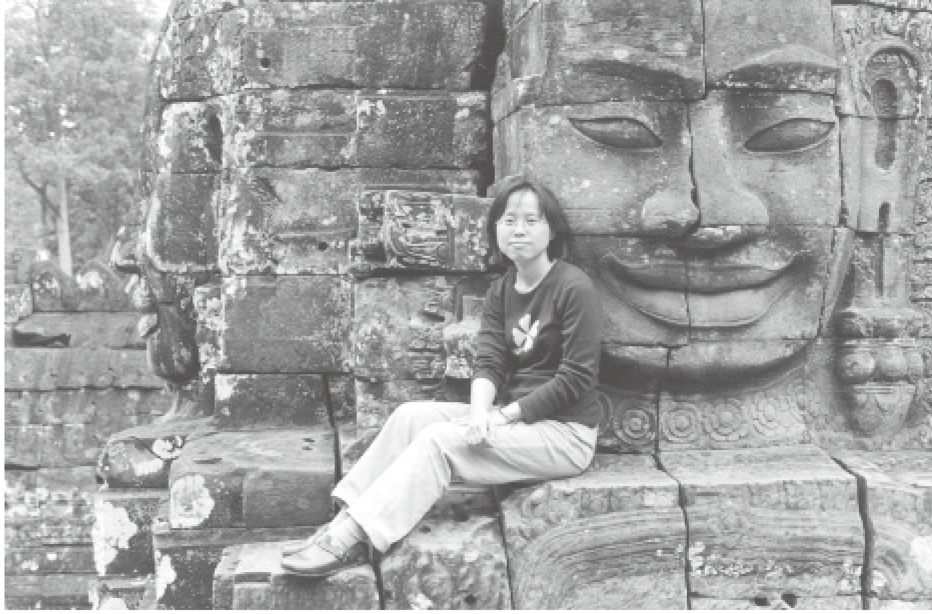
的美国友人Heidi一起翻译成英文。一位英国友人帮忙念英译文，我读中文原作。隐地的诗成为当天唯一的非英、法语诗文作品，最受欢迎。下台时，很多人问，“jimo（寂寞）是什么意思？”

活动结束后我们一群人继续在这间花园餐厅里喝酒吃饭。周末仍然工作的Mack迟到了，没听到我念诗，我向他解释诗的意思。突然间，我们同时抬头望着一名美国女人口沫横飞地说着一个小女孩的故事，Mack高喊，“我也遇到过那个小女孩！”并激动地摇着我的手臂。在场许多人都遇到过这个演技令人惊异的小女孩，听过同样的故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路历程与处理方式。当Mack对我大叫“我应该听你的”时，那名美国女子手持盛着红酒的高脚杯，开玩笑地对他说：“你应该听女人的话。”

听见那美国女人说这话时，我心凉了。虽然结果证实我的怀疑与分析是正确的，但我对Mack说，还好你没听我的。像Mack这样出生于印度、拿到美国经济学博士、长年在国际奔走、看尽第三世界落后但也享有联合国官员优渥礼遇的人，却没有放弃那人性中最基本的同情。我但愿自己和他一样被骗，而不是被自以为是的理性囚禁。

失去痛感，理性寂寞。我没能克服痛的文化差异，悲恸始终存在。

周末晚餐，我和Emma常开着办公室的敞蓬卡车去金边一间中国东北人开的饺子馆，我们最喜欢芹菜叶做馅的水饺和豆沙包。去那吃晚餐是周末一大享受，我们总是多点些食物，吃不完便打包回家。寻常地，吃饭时总会看见乞丐游民的脸贴着玻璃门往里看。在金边待久了，我们已练就眼不见为净的本事，专注于盘中飧。餐馆老板循例出去赶人，免得客人受干扰。



摄影丨蒂埃希·迪弗

用完餐，提着食物包，走出餐馆。一名年轻女子扶着一名盲眼老妇，迎上来卑微地向我们讨钱，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看起来是从乡下到金边讨生活的农民。两名瘦弱的农妇流浪金边，我想不出她们有何机会。犹豫了一下，我们递出食物，照例没给钱。我继续爬上卡车的驾驶座，车子开动。准备转弯时，瞧见两位女游民几乎没移动就在路口蹲坐吃起来了。餐盒内的食物暴露出来，看见两人开心地吃着我们刚用剩的食物，又听到Emma在一旁说，“她们一定很久没吃这么好吃的东西了”，我像遭电击似的，突然哭了起来，一时泪眼模糊，无法开车。

我为她们感到伤痛，也为自己感到悲哀。是什么样的世界，让人活得如此没有尊严，也让人活得不再勇于感受。

我的痛感回来了。我终究无法漠然以对。柬埔寨走一遭，看尽饥饿与疾病。所幸，我也深受感动。尽管历史的悲哀继续发酵，柬埔寨人的微笑依旧迷人，从古至今。那神秘的微笑，四度吸引我进入吴哥古城（Angkor Area）。那神秘的微笑，让我在巴阳庙（Bayon

Temple）决定给自己至少十年的时间，去了解艾滋病这令穷困已极的国家更满目疮痍的政治经济疾病。那神秘的微笑，挂在我周围每个柬埔寨友人的黝黑脸上。你见过那神秘的微笑吗？如果你去过柬埔寨，你一定看过；至少，我的法国摄影师友人蒂埃希·迪弗（Thierry Diwoo），也被那神秘的微笑吸引，出了一系列黑白摄影的明信片，就叫“柬埔寨的微笑”（Smiles from Cambodia），很受西方旅客欢迎，你也许看过。蒂埃希帮我和那巴阳庙国王的微笑拍了合照。长年独自旅行的我，很少有自己的照片，真要谢谢他替我留下这难得的纪念。

寂寞方程式

隐地

等不到风

树寂寞

等不到眼睛

画寂寞

剧场没有观众

椅子寂寞

思想没有性欲

夜寂寞

书籍布满灰尘

知识寂寞

创作者等不到欣赏者

灵魂寂寞

主人老了

镜子寂寞

没有光亮的颜面

欢笑寂寞

看不见船

河寂寞

等不到情人的抚摸乳房寂寞

（摘自隐地诗集《一天里的戏码》，尔雅出版社）

古城吴哥

从15世纪之前的风华绝代，到今日的颓圮破败，

吴哥窟见证了柬埔寨颠沛流离的多舛命运。



摄影丨黄丁盛

自1953年以来，不论柬埔寨的政治如何递嬗，吴哥窟（Angkor Wat）的尖塔始终矗立在柬埔寨的国旗上，代表这至少有着三四千年历史的王国。从15世纪之前的风华绝代，到今日的颓圮破败，吴哥窟见证了柬埔寨颠沛流离的多舛命运。

吴哥窟是吴哥古城中最宏伟的庙宇。整座古城，涵括9至15世纪的吴哥王朝时期（Angkor Period，802—1431），陆续建造起来的大小庙宇，其中著名的至少有二十座，吴哥窟是最主要的庙城建筑。即使在

15世纪吴哥王朝受泰国入侵，弃置吴哥古城南迁金边后，吴哥窟的佛像雕刻仍持续到18世纪。吴哥窟的柬文名称Angkor Wat传承自古印度梵语，Angkor意为“城市”，Wat意为“庙宇”，吴哥窟的重要性从命名中可见一斑。

19世纪50年代，欧洲传教士即曾传言柬埔寨北方丛林中有座荒废古城。但直至1861年，法国博物学者亨利·穆奥（Henri Mouhot）才在北方暹粒市（Siem Reap）郊区找到吴哥窟，其发现立即轰动世界。一座座宏伟细致的石寺，难以计数的石桥、石像、石壁雕刻，令观者屏气凝视。石像嘴角神秘的微笑直透人心，观者的魂魄似乎就要被勾了过去。石壁上仙女身着的薄纱在精工雕刻下仿若透明微动。穆奥的日志中记载了他首度见到吴哥窟时的震撼与敬畏情绪。随后法国探险家与学者蜂拥至吴哥窟，并陆续发觉古城内的其他庙宇。

19世纪末，法国政府正式开始吴哥文明的研究与保存，但如此的人类文明瑰宝却遭波尔布特严禁维修。随风而来的大树种子趁隙钻入土里、石缝中，发芽茁壮，破坏了寺庙的根基，树根沿着石墙、石柱蔓生，倾塌之日不远。古城里的参天古木令我心生畏惧。更引人唏嘘的是，内战时期枪战遗留下来的子弹还镶嵌在石柱上，屡屡可见。

1989年，越南势力退出柬埔寨，历经二十余年战乱的柬埔寨进入改革开放时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将吴哥古城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以日本为主要的经费与技术赞助方，开始努力抢救保存古文明遗迹。吴哥古城内的每座庙宇都可见到正在进行的维修工作。

吴哥古城内各间庙宇的雕刻，随着年代不同，表现出不同的政治、宗教纹理。吴哥王朝先是受到印度教的影响，社会阶级制度明显。12世纪中叶，国王苏耶跋摩二世（Suryavaman Ⅱ）便建造吴哥窟，祭献于印度教的护持神（Vishnu）。吴哥窟面朝西方，其外廊建筑的方向由西北方起始，反时钟方向绕城一圈，这些方向在梵语中的意思与死亡有关，因此考古学上有一说，吴哥窟是座大陵墓。

吴哥王朝于12世纪遭外族（Cham）入侵，古城遭到破坏，信仰大乘佛教的国王阇耶跋摩七世（Jayavarman Ⅶ）将以巴阳庙为中心的大吴哥区域（Angkor omm）重建为佛教城市，位于吴哥窟北方。这位国王死后，约1220年左右，由于受到现今泰国境内小乘佛教民族的影响，吴哥王朝逐渐变成以小乘佛教为主的国家，并逐渐往南方迁移。吴哥王朝复杂的政治历史，在古城的庙宇中留下印度教和佛教消长交会的明显痕迹。

我最喜欢的吴哥庙宇，是12世纪建筑的巴阳庙。还没走进庙城，远远地就可看见巨大的四面头像竖立城门上方，那就是信仰大乘佛教的阇耶跋摩七世国王的石像。第一次走进这座庙宇，我就被国王的微笑迷住了。后来得知国王是位“革命家”时，更加了解了其微笑的魅力所在。阇耶跋摩七世国王打破先前的印度教传统，接受大乘佛教的洗礼。两种宗教帝王的最大差别，在于佛教君主以怜悯仁慈对待人民，而非如先前的印度教君主以威仪治民、视人民为奴隶。因此，柬埔寨人说，巴阳庙林立的头像，代表着国王守护着他的王国子民。

还有一座早于吴哥窟的女神庙Banteay Seri，也令我惊异不已。这间规模只有一般庙宇一半大小的古寺，建于10世纪，位于吴哥窟东北方二十五公里处；大多数行程匆匆的观光客都会错过这间庙宇，实在可惜。这间女神庙的雕刻及雕工皆堪称一绝，庙堂入口只有一点三米高，非由国王建造；雕刻的人物偏好少年，坚硬无比的粉红色石头均刻上花边，再精工雕琢出栩栩如生的微笑男童、女孩、水舞精灵或仙女（Apsara）。有赖于石头的异常坚硬，虽已经过10世纪风雨人祸摧残的石雕，如今看来，仍栩栩如生，仿若近期完成的刻工，细致的程度令我叹为观止。

吴哥古城彰显了人类至高的文明艺术瑰宝，即使柬埔寨社会动乱频仍，每年数十万的国际旅客依旧前来朝圣。一般而言，以日本为主的亚洲旅客常参加三天两夜的游览行程。台湾团甚至破纪录当天金边

—吴哥窟来回，我想这些旅客八成是和吴哥窟前方水池的尖塔映照合拍一张后，便返回首都金边。不少欧美旅客参加五天四夜的活动。法国人特别心仪吴哥窟，很多中老年人参加一周至十天的深度旅游行程。无数的国际年轻自助旅游人士，就在吴哥窟晃荡，不受时间安排限制。我就是那种招租全天的摩托计程车，在各间庙宇穿梭闲聊，累了就坐在树荫下、坠落的巨石上喝凉水的幸运旅客。

吴哥窟这碗老祖宗饭，不仅喂饱了柬埔寨政府及当地居民，也让生活在这生灵涂炭土地上的人们，存有一丝古文明的傲气与慰藉。吴哥古城中，几乎每一座庙宇的神祇周围，都有当地人焚香膜拜挂幡的痕迹，更常见老妇礼拜的身影。我曾在一座没有观光客造访的庙宇的隐秘洞穴中，见到一名中年男子在祭拜仙女，我问他对仙女的感觉，他说，他做梦都会梦到飞舞的仙女，美妙极了。没错，神话里，水珠飞溅的仙女舞姿真是曼妙，在石雕上经常可见，我也买了一幅水舞精灵的仿造拓碑画。

说到拓碑，许多庙宇的石壁雕刻，不是被长年的拓碑墨汁弄得大片漆黑，就是缺了一块；佛像、仙女、神祇的头部、手部消失，盗采盗卖的文化浩劫随处可见。在金边的历史博物馆中，有许多从吴哥古城和其他古迹地运来保存的无首断肢残臂石像，这里是我见过最令人无可奈何的历史博物馆，文物散落各处，乱无章法。更令我啼笑皆非的是，生平第一次见博物馆内香烟氤氲，老妇在馆内的石雕佛头像前焚香膜拜，香炉插支满溢，显然她们每日来此祈福。博物馆四处可见动物粪便，抬头一望，原来，巨大的蝙蝠盘踞博物馆屋顶，黑压压一片；博物馆还曾为了处理蝙蝠的问题休馆；漏水的问题更非新鲜事。真是穷国难为！

许多人都是从金边或曼谷搭飞机到吴哥窟旅游。我喜欢搭船，由金边上行洞里萨河，见识水乡泽国。离吴哥窟不远的洞里萨湖，是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水中丰盛的渔产和湖畔农田加惠周遭居民。这里

是柬埔寨自然环境最优沃的地区，许多人逐水而居，家就住在水上，渔获在哪儿，家就划移到哪儿。不少越南人也中意这里丰富的物产，移民至此，自组水上越南村。水上人家的行动敏捷一如陆居，孩童在狭窄的小船上互踢足球，欢乐不减。我参加过一场水上人家的婚礼，客人吃了东西就往水里扔，难怪鱼肥虾美。

世上的古老文明都出自大河文化，柬埔寨也不例外。吴哥古城一游，任谁都愿意祈祷：经历了二十余年的苦难后，柬埔寨的希望也能如水舞精灵般破水而出。

过桥

不是有一句老生常谈的话吗?

“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长。”

柬埔寨的经验让我对此说法别生感触。

人生阅历多寡有时并非以道里计，事件的惊异程度决定生命印象。



摄影丨黄丁盛

不是有一句老生常谈的话吗?“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长。”柬埔寨的经验让我对此说法别生感触。人生阅历多寡有时并非以道里计，事件的惊异程度决定生命印象。

河流密布的柬埔寨，桥非常多。从金边到南方干丹省Koh Thom我的高脚屋所在的工作地点，不过五十七公里远，雨季开车得花上三小时，干季也要两个半小时。在这条柔肠寸断的黄土尖石路上，共有四十五座桥，绝大多数都是木桥，即便是石桥，也是败破不堪。

每星期我在金边与乡下来回往返，桥上风光，看尽柬埔寨乡间情事。

有几座木桥腐朽特别严重，开车其上是危机重重，经常闪了左边的大洞后，右前方又立刻出现另一个大洞。有些桥则是横切面整片木头断裂，一连数片，造成桥面上出现宽度超过一公尺、长度三公尺的大黑洞，令人寸步难行。

桥面上出现的若是“整齐四方”的大洞，那铁定是乡民的杰作。有时桥面上的木头腐朽但尚未完全断落，勉强还能支撑汽车过去，乡民却会硬生生地将之撬起，他们甚至会撬起完好的木头搁在一旁，造成破洞的人工效果。

在贫穷的乡间，这是乡民的营生方法之一。

他们一看到汽车驶近桥头，就立刻在你眼前表演把木头搬离桥面的本事，这个动作是要告诉你：不给钱？别想过！一次至少得给价值十台币以上的柬币，在这里可以买一公斤的空心菜了，一般乡民的月收入也不过台币两百元左右，甚至更低。



摄影丨刘绍华

我还亲眼见识到什么叫作“过河拆桥”。有一次一座桥断裂得相当严重，在连乡民都尚未找着大木板赚钱之际，只见一辆运甘蔗的超载大卡车开过，甘蔗堆上还坐了四名工人。一名工人手脚灵活地从离地面约有三公尺高的甘蔗堆上跳下，再不疾不徐地从车下底盘抽出两大片木板放在桥上。大卡车顺利过桥后，仍停在桥头，待该名身手非凡的工人将两片大木板收走后，卡车才从容不迫地往前行驶，留下一列尾随其后的汽车，人人目瞪口呆，望桥兴叹。

柬埔寨境内有非常多四肢残缺的年轻人，大多是遭地雷炸伤的，这些人没什么营生的本事，多沦为乞丐。某回我开车近桥头时，一位断腿青年朝我走来，我按了下喇叭提醒他，他仍继续一拐一拐地往前逼近，我发现他是算定了我不可能驶过他，故意向我的车子走来的。他一只手高举着一条法式长面包，另一只手放在我的车头，强迫我停车。我停驶后，原本那只放在我车头的手突然抬起，改变成掌面朝天讨钱的姿态。我不理他，双方僵持着。我只好倒车，他见我倒车，又往前走。我往旁边闪一点，他也跟着我闪。就这样左闪右闪，他突然跑到我的驾驶座旁，隔窗讨钱。我见是个机会，加了油门就往前跑。

还有一次，碰到两名异想天开的断腿乞丐，见我的车驶近，就走上桥，一名笑着伸帽向我要钱，另一名索性坐在桥中央，坐定后还斜看了我一眼，一副“你敢过吗？”的样子。我死也不给！把车停了。一个讪笑讨钱、一个霸坐桥心、一个死不退让的画面僵持着。我想就等罢！等着等着，我觉得这场景蛮难得的，拿起相机从驾驶座上将镜头对准两人。咦？他们不知是否看见相机很紧张，居然立刻闪人，我也就顺利地过了桥。

一天，某座桥突然在夜间塌方，一根桥基全垮，土石严重滑落，活像地震后的景况。坍塌陷落的桥，比“U”字型的滑板练习场还歪斜许多，步行其上相当吃力危险，但是当地乡民却一如平常骑着摩托车或脚踏车过桥。看着乡民推着绑满货物的脚踏车冲下去，再由几个人帮忙往上推的场面，我真为他们捏把冷汗。有些小型汽车仍企图驶过断桥，于是就会有人为了小费自告奋勇，站在桥上指挥车子。这些勇夫真是为钱搏命，汽车驶下后势必得加速往上冲离桥面，他们却一夫当关，在汽车开下桥面之际依旧站在桥心指挥，直到汽车冲到跟前才往旁闪去，状况非常恐怖。



摄影丨黄丁盛

我下乡工作的地理范围颇广，时常要搭船渡河。所谓渡船，就是把两艘普通小船并在一起，上面再叠贴大木板而成。有些穷地方买不起马达，还用古老的拉纤方法。两名男子，在炽烈的中南半岛阳光下，各据船身一方，以人力行舟。因为两人使力劲道不同，船只时而左倾，时而右斜，坐在这种船上，眼前风光相当“摇曳”。

别看这种船只拼拼凑凑的好像没什么承载力，它的乘客可是包罗万象。有打着黑伞的步行和尚、上下课的学生，也有牵着脚踏车坐船的人，后座绑满的货物，使得脚踏车看起来活脱脱一个头重脚轻的大蘑菇。摩托车骑士更是由岸边直冲甲板，停车距离计算得非常精准，不会落到水里。

当船只准备靠岸的那一刹那，更是见识乡下人本事的时刻。尽管船身距离岸边还有一块不等边三角形的空隙，很多人，尤其摩托车骑士总是领先群雄，一拥而上，咆哮而去。有时空隙实在是大，可是我从未见人或是货物落过水，功夫真是了得。

在这里开车过桥，最无奈的其实不是碰上无赖或乞丐，而是牛车。堪称庞然大物的白色耕牛拖着载满货物、野草的牛车，偶尔还有另一头牛尾随于后，悠闲地吃着车上的野草，令我无力招架。我虽爱极牛颈上牛骨做成的牛铃叮叮咚咚声，还有跟在巨大的牛屁股后，看着它一扭一扭、尾巴不时扬起的徐缓闲适，不过，牛步就是牛步，等它过桥还真是需要耐心。

柬埔寨的生活逻辑

某个当地人闪了右灯却左转，被警察拦下，

警察问他为什么这么做，该名老兄真是天纵英明，

他对警察说：“你没看过拳击吗？不都是向右虚晃一招！可是实打左边哪！”



摄影丨黄丁盛

神经粗一点，弹性大一些，在柬埔寨生活会很有趣。否则，可能有骂不完的三字经。

一个朋友来柬埔寨，想顺道去越南自助旅行，旅游资讯、办签证、订机票的事理所当然认为可以全部找旅行社处理，我告诉她还是

分开来办比较快，有些事也得靠自己才行。她不信邪，坚持旅行社的普世功能。我只好给她金边的旅行社电话，由她自己去询问。

就像在台湾一样，朋友不厌其烦地对接电话的柬埔寨人提出一堆问题和要求。边工作边听到她讲电话，我忍不住插嘴：“你说的太复杂了，他听不懂啦！”朋友给了我一个臭脸，挂上电话后，有些挑衅地说：“他说没问题，等会就回我电话。”我耸耸肩，继续手上的工作。过了一个小时，电话静悄悄地躺在那里，朋友问说怎么还没打电话来，我的回答肯定很泼冷水：“不会打来啦！你问什么他们都会说好，不懂也说好，不行也说好，你就不用等了。”朋友发飙了，打电话去追问，原来和她说话的人已不知去向，接手工作的人一问三不知，但同样很客气地招呼她，一向不屈不挠的朋友又重复了一遍她的问题和要求。说到这里，用膝盖想也知道结果如何。

同一个朋友，去市场买了一个凤梨，回来自己削皮切了吃。削完厚厚的一层外皮，她继续削，我说这样就可以吃了，再削就没肉了。她指着果肉上凤梨特有的毛毛疙瘩说，“不削这怎么吃啊？”“我们就这么吃啊！这里的凤梨不像台湾的改良过了，都是这样的。”不信邪的朋友继续清除那毛毛疙瘩，削啊削的，最后，削到肉心了，疙瘩还在。她真火了！

两个分别来自新加坡和德国的友人也来柬埔寨，借住金边办公室楼上的空房。第一天平安无事，一切都很新鲜有趣。第二天，外出房门上锁后，就打不开了。两人气急败坏。钥匙就只一把，但怎么都打不开。我说等一等，上午试不成，也许下午就打开了。这里就是这样，明明是一套的东西可就是配不准。对两位来自严谨国度的友人，真是一场令人疲累的文化冲击。

在柬埔寨第一次过生日那天办了个聚会，邀请几位熟识的国际友人来金边家里吃饭聊天。大伙带来的各国料理都上桌了，独缺Fred和Alex两名好友的法国美酒与甜点，他们迟到了近一小时。在柬埔寨的

法国人多维持他们的生活特色，赴宴会晚到一小时，晚餐吃得很晚，九点、十点才开始。法国人吃饭一定品酒、聊天，绝对不能闷头大吃，所以一顿饭吃得长长久久，经常吃到倒头大睡。但Fred和Alex是旅居柬埔寨法国人中的奇葩，有着法国人的一切美好，但没有多数在柬法国人的骄气与霸气，颇融入当地社会，也一向准时。

两人终于姗姗来迟。一拉开大门，Fred推着他的小摩托车哇啦哇啦地大叫，Alex努力用她不甚流利的英语解释发生了什么事。原来，他们按了三间门牌“15b”的人家才找到。Fred说，同一条长巷，他就发现了三户人家门牌号码一模一样。我们大笑起来，这种事在场每个人都遇到过，只是我还不知自己的住处也是一例，而且居然一条巷子就有三家，这概率也太高了。真是不知邮差如何办事。

某天一早在楼下办公室开始准备工作，突然间，负责清扫办公室及住家环境的管家冲下来大叫我的名字，叽哩呱啦神色惊慌，我还没听懂，就见其他刚进办公室的柬埔寨工作人员冲到楼上，我也跟着跑上去。只见我的房里积水，浴缸上方的热水器掉在浴缸里，水从破裂的水管中喷出。我愣在那。半小时前我还低头在那热水器下方洗头哩！想到就头皮发麻。工作人员检查了一下，发现那重达好几公斤的热水器居然是“贴”在墙壁上，而非用钉的。大伙七嘴八舌地在房里讨论起来，还笑得很高兴，忘记早已开工了。

在柬埔寨，面子和里子可真是两码事。

柬埔寨的加油站有限，只要离开了金边和少数的乡镇就找不到加油站了，要买油就得到有卖柴油的小店里或是路边摊。在乡间路旁卖凉水的小摊上常可见到一排排的宝特瓶，许多初来乍到的外国人都以为那是解渴的汽水或凉水，可别误会了，里头装的可是柴油，喝了会要人命的。曾有个台湾记者来柬埔寨采访，渴得差点买了宝特瓶来喝，后来得知是柴油时，吓坏了。

证书满天飞是面子和里子不合的另一显例。每个找工作的年轻人都会出示各种补习文凭，电脑的、汽车的、语文的，还有很多想都想不到的，耗费的金钱与心思可真不少。不过，这些表面上看起来认真学习了许多知识技能的人，真正开始工作时就会穿帮，什么都不行。一名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来应征我新计划的助理一职，带来十多张形形色色的专长证书，可面谈时一问三不知。那些文凭都是空头支票。

交通更是集表面功夫之大成。柬埔寨的法律规矩可多哩！但交通状况岂一个“乱”字了得？老百姓横冲直撞，警察莫名其妙。先从驾驶座说起吧！在柬埔寨，英式、美式的驾驶座位同时并行，有人开左边，有人开右边，开右边的大概都是从泰国走私进来的轿车。虽说政府三令五申要禁止开右边的车子上路，但是除了联合国、使馆和非政府组织（NGO）的车子外，多数的私家和政府高官的车子都是开右边的。

车牌也是一绝。不论是摩托车还是一般汽车，都是买了车子后才由买主自己去申请车牌。1998年时，原则上一张车牌，摩托车是四美元、小型车十二美元、卡车十四美元，但事实上，可没这么便宜，通常要几十美元，而且手续麻烦，还会碰上官员刁难索贿。所以啦，假车牌满街乱窜，要买California的车牌路边就有，或是干脆让车子“光着屁股”，连假的都省了。到处都在卖假车牌，光明正大的，警察也不抓。

只有NGO、使馆、政府和军警会用真牌。这是有原因的，因为在柬埔寨不同单位的车牌颜色有别，好处当然也不同。NGO是蓝牌，使馆是橘牌，政府是绿牌，军警是红蓝相间牌，一般人则是白牌。遇上路检时，只有白牌的会被拦下，其他的通行无阻。

柬埔寨自从1990年就开始实施这种牌照制，但始终执法不力。初来乍到时颇为困惑，这么贪钱的政府军警，怎么会放过大好的税收或罚款的机会呢？后来渐渐了悟明白：贪污的官员当然不会努力制度

化，否则哪有油水可捞？所以啦，警察专挑驾驶人的小毛小病找碴，理由荒谬得经常令人发噱。

这里的警察当然不会说英文，可是有一句英文可是人人琅琅上口。办公室司机Sokal告诉我一则笑话，话说一名欧洲旅人在金边触犯了交通规则，警察将其拦下，该名老外想和警察搭讪逃避罚款，他对警察说："Hi，how are you？"（嗨，你好吗？）警察回说："I am fine and fine you five。"（我很好，罚款五块。）一言以蔽之，"Fine you five"是柬埔寨警察必备的语言能力哩！

在柬埔寨开车，交通标志常常是"躲"起来的，它的作用好像只是让警察拥有拦你下来的理由，而不是为了提醒驾驶人。有一回我在禁止左转的十字路口左转，那个交通标志被移到远远的树木后头，我当然没看到就被警察拦下了。拦下后，四名警察一齐上来。这里得说明一下，金边的警察喜欢集体行动，总是一群群守在路口，有毛病大伙一起挑，有油水大伙一起捞。其中一位头头问我："驾照呢？"我说："在办公室。"他夸张地摇摇头说："喔！没有驾照要罚钱喔！"然后又接着说："给钱就OK！"我说："多少？"他说："五元（美金），这里有四个人，共二十元。"这里的人和外国人的交易都用美金，他当我是凯子？！当时教育部长的账面月薪不过价值二十美元。我说："一元。"他又夸张地摇摇头，然后说："没有就到警察局。"我想了一下，如果到警察局你一毛也捞不到，所以我说："好啊！那就到警察局去吧！"结果他真的愣了一下，然后改口说："一元OK，四个人一人一元。"我坚持说："全部一元。"就这样，因为他担心拿不到钱，所以我们就以一美元成交了。我一个日本友人则是以每人一瓶可口可乐成交。

说到驾照也是一件可笑的事。这里驾照都是用买的，交通会这么乱也与之有关，因为人们都没学习过正确的交通规则就上路乱开了。一张驾照四十美元。可是呢，你可能办了好几个月也办不下来。这是

一个贪污泛滥的国家，所有问题都是人治处理而非法治。我一来就花钱买驾照，等了快三个月了还没拿到，原因是交通部长换人，所以又得重新处理，旧部长处理过的都不算了。

在金边开车，最怕人力三轮车和摩托计程车。这里的人没有装后视镜的习惯，他们要转弯时，手一伸就算通知了，完全不管你是不是已经非常靠近他，反正撞到他——除非人死了——医疗和赔偿够你付的。说得卑贱一点，反正“烂命一条”，被撞伤了搞不好家人还有好日子过。

开小型车的不见得就多懂些交通规则，到处有人逆向行驶，而且理直气壮。经常一辆来车突然笔直地出现在你面前，两辆车眼看就要撞上。照理逆向者要快闪，可是有本事搞飞机的人当然胸有成竹，会闪的一定不是他，你只好边骂“痞子”边闪人，不然你能怎样?

在市区一般的天气状况下，很多人晚上爱开雾灯或不开灯，警察不管。不过，如果你白天忘了关灯，警察却会将你拦下，说你违反交通规则，因为白天开灯“会干扰别人的视线”。

柬埔寨人使用方向灯也是天兵之流，经常闪右灯转左边。一个据说也是真人真事的笑话：某个当地人闪了右灯却左转，被警察拦下，警察问他为什么这么做，该名老兄真是天纵英明，他对警察说：“你没看过拳击吗? 不都是向右虚晃一招！可是实打左边哪！”警察没辙，挥挥手就让他走人了。

柬埔寨的生活逻辑，常令来自优渥地区的住民惊异恐慌。但在横冲直撞之外，柬埔寨的优美自在也不是所谓先进地区的人能享受到的。有兴趣了解这个国家生活肌理的朋友，可以先估量一下动心忍性的意愿与能耐，再决定要待多久咯！

异乡人

绝大多数的外国人终究会离开柬埔寨，

因着各式各样的理由，

都无法继续待在这个国家。离开时，

会留下女人、孩子、朋友、负债、疾病，也会留下计划与感动。



摄影丨黄丁盛

柬埔寨是个光怪陆离的国家。除了近二十年内乱的历史因素外，成为西方国家的民主实验地也是造成它怪异的原因。首都金边市最能呈现第三世界的诡异面貌，它拥有贫穷国家难得的硬件建设，也存在

发达国家无法理解的紊乱落后，它的发展模式与台湾几十年来的循序渐进截然不同，忽贫、忽富、忽野、忽礼，令人叹为观止。

金边的奇特，与进驻这个国家提供外援的联合国与各式非政府组织（NGO）等国际机构有密切关系。1991年联合国势力进入柬埔寨，将三十万于“红色高棉”时期逃至泰国边界的柬埔寨难民陆续遣返回国，成列成队的大卡车，载满返乡人潮驶入金边和柬埔寨各地，许多原本在泰国难民营服务的国际组织也跟着移转阵地，进入柬埔寨，更多远道而来的国际组织也接踵而至。我在柬埔寨期间，金边就有一两百个国际NGO注册进驻，没有注册的组织也号称有一两百个，展开教育、健康、地雷、游民等各项发展协助计划。

柬埔寨确实受惠于庞大的国际组织援助，但是国际组织的存在也打乱了金边的市场经济，由于柬币的汇率不稳定，形成美金和柬币两套通行的货币制度，以外国人为主要交易顾客的商店用美金计价，老百姓的日常买卖则通行柬币。

两套货币制度使得美金持用人每天都在莫名损失金钱。在金边消费，单位为毛的美金计价，商家都以柬币找零，由于汇率浮动颇大，一美元约可兑换三四千柬币，商家都以最低甚至不足额的汇率计算，于是每消费一次，消费者便很可能损失二至五台币，五台币的价值可以在传统市场买到四根小黄瓜。

国际组织进入金边，当务之急是解决吃住问题。外国人住不惯当地破败狭小的木屋，吃不进腥辣不净的食物，于是一间间有如别墅的高级住屋纷纷出现。流经金边的洞里萨河与湄公河畔，各国料理餐厅也陆续开张，所费不赀，一份简单的客饭至少索价四点五美元以上，而当地每人一个月的基本生活费约为十美元。

国际组织面临的另一问题是语言，许多曾待过难民营的柬埔寨人在营区学过英语，返国后就成为国际组织的最佳翻译。人才有限，加

上自开放起联合国的高待遇政策便打乱了薪资市场，导致在柬埔寨最好的工作就是替国际组织机构服务。柬埔寨的教育部长账面月薪不过价值二三十美元，但是在金边市担任国际组织甚至一般外国人士的清洁管家，一个月至少就有六十美元。

柬埔寨的公务员和教师薪资极低，所以工作意愿很低，四小时的工作可能做了一小时就落跑，同事间也很有默契地轮守就好。很多人跷班回家照顾小生意，也有人戴上棒球帽、穿件长袖衬衫，骑着自己的摩托车往街上去，就成了载客的摩托计程车了。

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国际组织的存在无意间也使柬人缺乏信心。整个国家相当依赖外援，柬埔寨是一个没有外援几乎就撑不下去的国家。笃信小乘佛教的柬埔寨人，在柬国各地盖了无数间庙宇佛塔，甚至天真到希望NGO赞助建庙，令NGO工作人员啼笑皆非。

一个没有自信的社会，女人的命运最是多舛，不少柬埔寨女人以为最好的出路是嫁给外国人士远走他乡。也许真有人“麻雀变凤凰”，但就我所见，温柔美丽的柬埔寨女性，常在与外籍人士的婚姻假象中沦为免费的性伴侣、厨师兼管家。

柬埔寨是法国前殖民地，也因此，来这个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法国人士最多，形形色色，外交人员、国际组织工作人员、法语教师、商人、游客、通缉罪犯乃至偷拐抢骗的角色都有。绝大多数的外籍人士不愿学习柬语，至多说上几句日常用语，什么理由都有，“难听”“难学”“没用”“不打算久待所以不想学”，等等。人力便宜，少少的银子，就可雇用当地人处理日常生活琐事，洗衣、煮饭、打扫，不会说柬语也可过得舒服享受。

在法国人的圈中，常听说谁谁谁和管家结婚但回国前就离婚了，或是谁谁谁的离婚柬埔寨老婆被谁谁谁雇去当管家了。曾嫁过法国男

人的柬埔寨女人离婚后的出路常是当法国人的管家，因为一定被调教过该如何烹煮法国料理。

我曾遇过一名法国政府派去柬埔寨教法文的年轻人，说话知书达礼，他有一个年轻貌美的柬埔寨女管家，经常穿着小可爱及短裤做家事，朋友间开玩笑说是不是情妇，那道貌岸然的法国人义正辞严地说，女管家的法国前夫回法国前和她离婚了，见弃的柬埔寨女子很难再嫁人，他好心收留了这名女管家，否则她只能沦入风尘讨生活。但朋友都知道，这台面上的话是法国男主人的标准假答案。

法国有海外替代役的制度，女子也可要求加入替代役的行列分发至前殖民地工作，不少来柬埔寨的法国年轻人是经由替代役的途径出来的。一位法国友人曾说起，每年法国政府都得从柬埔寨遣回三分之一的年轻人，原因是抑郁症。“善终”离开柬埔寨的人似乎不太多。

柬埔寨就像是个大难民营，收容来自各国的通缉犯和自我放逐的人。很多西方人不知道在自己的国家要做什么，就拿观光签证进入柬埔寨，之后再花二三十美元买几个月的签证。盘缠用完了，就教英文、法文维生，但很多人连自己的母语都说不好，只好偷拐抢骗。曾遇过一个法国口音的年轻人上门来讨钱，声称自己是来自美国的自助旅行者，旅费被抢了无法回家，拜托我借贷些许现金。他当我是亚洲人分不清美国、法国口音，真是文化本位主义的笨蛋骗子。还有一个美国女人也喜欢到处找亚洲NGO行骗，声称自己是计划执行专家。这些西方年轻骗子，认为亚洲人好骗。

有些欧美年轻男性真以为自己可以在亚洲予取予求。有回周五夜和一群法国人去金边南方郊区Takmao的柬裔法籍大户人家玩，约好在金边市的法国文化中心前集合。我坐在朋友的车上等人时，一名法国年轻人走到窗边搭讪，一看就知道大学刚毕业没几年，劈头第一句话是“我可以引诱你吗？”下一句便接着说起自己在法国大使馆工作，月薪二千多美元，像只年轻公孔雀般得意扬扬。我看着他，心里觉得好

笑，他一定以为亚洲女人都会崇拜他的国籍与收入。我回说：“喔！以你的年纪，你的薪资算不少了。”他以为我在称赞他，继续抖动他自以为是的闪亮羽毛。

悲哀的是，外国男人真的经常攫取柬埔寨女人的青睐。

某天晚上我和好友Mack在洞里萨河畔散步。难得凉风习习，我们就在河边石阶上坐下来，继续我们经济学者与人类学者天敌式的对话争论。他总是嘲笑我说，“你们人类学家一个小村庄的研究还没做出来，我已做完四个国家的研究了。”我们在讨论的是刚发生在西雅图的WTO抗议示威活动。Mack主张全球化，我持反对意见，我们正争得面红耳赤，一名柬埔寨女子完全无视我们的讨论与我的存在，走到Mack的面前媚笑地与他搭讪。Mack看着我，他不知所措的表情真有趣，因为他完全不知道那女的在说什么。他尴尬地问我：“她为什么找上我？我旁边还有个女伴哩！”我乐得作壁上观，并帮他翻译。那女子问他在哪里工作，也自我介绍在哪家酒吧上班，今天休息，但明天就回去上班，要Mack到酒吧找她。Mack一边称赞我的柬语听力，一边为我居然当起他与该名女子的中间翻译觉得可笑。是名君子的Mack向那女子道谢后，就说我们还有事，站起来走了。

但我见过更多的外国男人不像Mack一样尊重当地人，遑论“妓女”。金边一家台商开的马天尼酒吧很有名，在洲际饭店（InterContinental Hotel）旁边的巷子里，入夜后涌入大量的流莺与国际寻欢客。那些年轻的柬埔寨女性看到外国男人就贴身过去，常见臃肿丑陋的白种男人搂着卖春女子，毛手毛脚地，喝完手上的廉价酒，占完便宜拍拍屁股就走人。听说有些女子跟人出去后，交易完成一毛也没拿到还被揍。

但流莺还是见过世面的，很多卖春的女孩连金边是个什么模样都不明白。

柬埔寨也有另一种外国人，他们的际遇和一般指称的老外很不同。金边市中心有一片卡拉OK红灯区，很多越南女子在那里卖春。越南是社会主义国家，明确禁娼，因而很多女性移入柬埔寨卖春。我一直都想多方了解东南亚女性的生活，听说一个法国摄影师友人在拍那里的越南女子，我就嚷嚷着要跟着去看。

这是我第一次走进“水族箱”。所谓的水族箱，就是进门后便会看见一大片的落地玻璃，玻璃后的台阶上坐满了年轻女子，每人左襟上别一个号码牌，嫖客就在玻璃外的长椅上坐着挑选。就像去水族店买热带鱼一样，选中了，老鸨就帮你把鱼捞出带走。

大概从来没有女客人走进去过，更何况是一名亚洲女人。我一进去，长椅上的嫖客都瞅我一眼，水族箱里的女子也盯着我看。中场休息时，十多只热带鱼全游了出来，围在我身边，好奇地问东问西。我们用支离破碎的柬语、越南文、潮州话和身体语言沟通。一个看起来未成年的女孩指着我身边的白种法国男性友人，“他是你先生吗？”“不是。”“那他给你多少钱？”我愣了一下，笑说：“我比他有钱。”

我的回答让我的朋友有些恼，也令那些女孩困惑。另一个自称十九岁的女孩问：“你怎么可能比他有钱？”我告诉她们我在国际组织工作，有固定收入，也有自己的租屋。女孩们不解，总认为我是住在另一栋“宿舍”里。我意识到，她们不能理解的是，我一个亚洲女人怎么会有自己的住处甚至比西方男人有钱。我不记得放弃让她们明白还有不一样世界的我，是怎么漂离那水族箱的。

有一回熟识的台商带我去一间台商开的茶馆，服务员都是中国大陆来的年轻女孩，穿着旗袍陪客。招呼我们的女孩约只二十岁出头，长得很漂亮，只是脸色阴沉，我和她说话，她都回答，但显得很不快乐的样子。她来自湖南，签了两年约，问她两年后还要留下来吗？她头摇得决绝。本以为能出国打工赚钱，没想到第一年是做白工，手上没见过一个子儿，薪资全去还中介及老板的债了。更惨的是，一年三

百六十五天，全年无休，来到金边近一年的她，从没自由出过门，没上过街，不知金边长个什么样。我哑口无言，只能默默地嗑瓜子。临走前偷偷告诉她，哪天若有机会出来透气，可以打电话给我，我带她去逛金边。她快要哭出来似的点了点头。

但我离开柬埔寨前，从没接过她打来的电话。

在柬埔寨的外国人形形色色，但我见过最漠然的外籍人士，却是回乡赚钱的海外柬埔寨人。因缘际会，柬裔法籍的摄影师Paul通过友人想拜访我工作的农村，刚从法国返乡的他，受杂志之邀拍些乡间故事。我们两个外国人走在村里，Paul带着黑色太阳眼镜，很酷，看不见表情，对谁都保持距离，直到他看见我一路上用柬语和村人打招呼时，说“你的柬语说得真好”，我才知他其实还记得他的母语。他开始态度软化，说起自己的故事。

几天后，Paul请我参加他的生日聚会，我第一次接触如此高档的柬埔寨家庭。我指的不是有钱与否，而是阶级与品味。Paul的父亲是柬埔寨军官，在“红色高棉”夺权前夕便知国家即将变天，秘密地带着家人逃离柬埔寨，转往法国定居。长大后，Paul留在法国变成摄影师，他的姐姐从事精工设计，作品挺有艺术性，嫁给一名澳洲商人。他们在金边的三层住所，看得出是文化圈人。然而，我讶异地发现，那对夫妻还有一项事业，就是出口柬埔寨劳工。

我似乎是他们回到柬埔寨后第一位在NGO工作的外国友人，得知我的工作是在“帮助”当地人，那位澳洲商人似乎想掩饰什么，净说他帮了多少柬埔寨人找到多少挣钱的机会。酒过三巡，真相毕露。谈起对柬埔寨的印象，大家不约而同提到乞丐，那名澳洲商人像发现新种臭虫似的，说他最受不了的是，乞丐讨钱时会拉他的衣袖，他脸上泛起极度厌恶的神情，“他们居然用手碰我！”

我很不以为然，但碍于在人家的生日会上作客，只乡愿地说：“他们没有恶意。”我不知我为何要替柬埔寨的乞丐说项。我看着Paul的姐姐和其他家人，大家继续嬉笑怒骂，全然不以为意。虽然看到Paul的脸上闪过一丝尴尬，我还是没久留，早早离席回家。

很多在东南亚长待的外国女性都会发现，西方男人真是主角，相比之下，西方女人的存在常被忽略。在泰国做性工作者研究的人类学家克利奥·奥德泽（Cleo Odzer）就嘲讽泰国真是白种男人的天堂，西方女人的处境却很尴尬。我一个加拿大的好朋友是哈佛的人类学博士，在新加坡工作时，也自嘲像她一样的白种女人在那里根本就被视为“垃圾”，一种不会讨好崇拜西方男人的多余人种。

不过，在柬埔寨，常令我感动的老外就是西方的女性友人，她们对生命有热情，对人有感情，不论性格轻松或严肃，坚持认真是常态。还是有不少令人感动的异乡人。

有一天，我的法文小老师Alex放在书架上首饰盒里的一百美元不见了。我去找她时，正见她在思索是她忘了钱摆在别处还是真的不翼而飞。通常发生这类事情，管家都会遭受指责或被革职。但Alex想到的是，一向手脚干净的管家Madam Hong是不是碰到了什么困难。Alex旁敲侧击问起Madam Hong的家人近况，几天后得知她先生生病住院，主动借了她一笔钱，也从不提起那不见的一百美元。

在柬埔寨进行田野调查的Karen，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人类学博士候选人。因着人类学的缘分，我们一见如故。某个周末上午，我们一同在金边洞里萨河畔的法式餐厅吃早午餐（Brunch）。这一带，是外国旅客在金边的聚集之地，临着美丽的大河，西式餐厅林立，以自助旅客为主的旅店也多在此。夜间与周末时，各餐厅、酒吧都挤满了外国人士与时髦的柬埔寨人在此消费。我和Karen到得早，露天的座椅区只有我们两个外国客人。我们喝着特级的柬埔寨咖啡，吃着法式早餐，兴致勃勃地谈着人类学和对柬埔寨的想法。

一个赤脚小孩背着擦鞋箱走来，问我们要不要擦鞋。我们低头望了一下，指着脚上的非皮质凉鞋，就对小孩说不用也不能擦，继续我们的谈话。那孩子不死心，又上前问我们要不要擦鞋，我只简单说了"不用"，Karen则不厌其烦地多加几句，告诉那小孩，我们穿的是凉鞋，不用擦，他也问过了，不该再来问我们。河边的擦鞋童很多，通常拒绝就是拒绝了，我从没见过像这个小孩一样的擦鞋童，他完全无视Karen的话，死心塌地一再重复问着"要不要擦鞋"。当过中学老师的Karen气起来，把小孩拉到身边，用她流利的柬语，向孩子训话。

皱起眉头、认真训话的Karen，着实令我感动。我见过的外国人，包括我自己，很少会花力气去"说教"。外国人高高在上，单手一挥，就让人不敢再靠近了，何须费唇舌。Karen不这样做，她努力要让那擦鞋童知道什么是尊重与廉耻。

绝大多数的外国人终究会离开柬埔寨，因着各式各样的理由，都无法继续待在这个国家。离开时，会留下女人、孩子、朋友、负债、疾病，也会留下计划与感动。几年后若我回去，当地的朋友见到我时会如何？那该是我曾留下的正负交错的生命记忆。

祭典、文化与艺术

柬埔寨这个国家虽然很穷，过起节来却一点也不含糊。

这是一个宗教与传统高于肚皮的地方，可以饿死很多人，

但可不能让国王与神明寒酸。



摄影丨黄丁盛

柬埔寨的节日多得令人眼花缭乱，而且连续假日特别多，这里只要是能放假的名目都绝不会错过，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知有没有放了一半。所以，在柬埔寨的外商和国际组织都自行删假，否则跟着政府核定的节日放假的话，根本不要做事了。

和许多经历威权时代的国家一样，柬埔寨的政治节日真不少。不过，像柬埔寨这样有着古老传统的王国，节庆当然才是假期的重点。

一年之中，10月底至12月初节日最多，先是10月23日的巴黎和平协定纪念日，这一天是1991年洪森在巴黎与国王签署和平协定，从此流亡中国的西哈努克国王终于可以回国，流亡法国的拉那烈王子也可以回国参选，接着就是1993年在联合国赞助下的首次民主大选。

10月30日是西哈努克国王的生日。11月9日是柬埔寨脱离法国殖民的独立纪念日。11月21日至23日是送水节（Bon Om Touk or Water Festival，和4月的泼水节不同），是柬埔寨一年之中最盛大的节庆，有划船比赛、放水灯活动、拜佛仪式，一连三天。首都金边的庆祝活动从国王生日便开始，张灯结彩一直维持到送水节时达到高潮。

12月10日是国际人权日。说来讽刺，这是一个人权不受重视、女性地位极低的国家。可是国际人权日和国际妇女节也是国家假日。

1998年10月30日西哈努克国王生日那天，我和我的华裔柬语老师玉珠、游民项目的助理Thyda，还有办公室警卫Tha，一块儿散步到王宫旁的林荫大道，这里有金边最漂亮的街景，王宫南边就是观光客常驻足参观拍照的黄金尖塔。有趣的是，这座富丽堂皇的塔被称作Silver Pagoda，而非Golden Pagoda。王宫北边就是国家博物馆，我后来曾在博物馆后院的工作室向一个中年师傅学捏陶，那里有木雕、陶窑等工作坊，博物馆旁的艺术学院学生就在这里实习。

前几天看《柬埔寨日报》，说最近很多北方地区的农民涌入金边，聚集到王宫前搭营，雨季又到了，乡间患大水，没有收成，农民希望国王赏饭吃。但是国王说他一个人没有办法让大家都吃饱肚子，要求有钱人出钱给饥民。

一个没有办法让人民吃饱的国王，凭什么当国王呢？我问我的同伴们，玉珠和Thyda说国王不好，年纪最小的Tha低头微笑没说话。玉珠和Thyda是一对姊妹花，华裔，两人的中文和英文都非常流利，柬埔寨开放后从泰国难民营回国。Tha则是台北海外和平服务团初到柬埔寨时房东的孤儿侄子，房东不照顾，台北海外和平服务团就收留了当时十七岁的Tha做警卫。Tha是一个憨厚腼腆的大男孩，很少表达意见。

君王在柬埔寨虽是虚位，但王国子民至今仍以国王为尊，只是国王长年不在国内，总是以生病为由远离国土人民，但他得的多是“政治病”。西哈努克常以生病需赴国外就医休养为由，暗地处理或远离政争，自愿流亡他乡；第一次运用此招是1953年，五十年了，真是一招半式走天下。近年来，西哈努克常待中国，声称急需中医治疗鼻癌。政敌常批评国王只知享受，不体民间疾苦，扬言要废除国王制，只是千年王国的人民难以接受。不过，西哈努克国王已于2004年10月7日宣布退位。

国王生日那天我没有看到农民搭营讨饭，不知是不是因为节日特殊被军人赶走了。我倒是看到了很多准备表演的人，还有一大群在王宫前草坪上玩耍的柬埔寨人。除了我周末早晨常去慢跑的、60年代兴建的奥林匹克体育场外，王宫和独立纪念碑附近的草坪是金边市区内稀有的大块空地，每到周末假日都挤满了人，野餐、闲聊或放风筝。当然，这里也有金边唯一的“游乐场”，虽然临时简陋，但超刺激，有摩天轮、旋转木马，还有那种会令人晕头转向的离心飞天椅。当然，少不了摊贩，小吃、水果、冰淇淋、彩券、玩具、二手衣服、小学习字本、辛辣八卦的杂志报纸，琳琅满目。

说到游乐场的摊贩，就想起我的苏格兰好友Lindsay，他常在这里吃炒面，一两千柬币一盘，不到五十美分，和老外去的餐厅里至少四美元一餐的价格比起来，真是好吃又便宜。不过，我只见过Lindsay一个老外在这里吃东西，绝大多数的老外考虑到此处的卫生条件，便避

之唯恐不及。褐发碧眼白肤，身高超过一米九的Lindsay，在体型瘦小肤色较黑的柬埔寨人群中，特别醒目。

Lindsay是我遇过最“专业”的背包族。他在柬埔寨北方山区旅行时，在原始丛林里也是裹着蚊帐式吊床睡觉，省去住宿费，还保有了行程的自由自在，甚至也多了和老虎相遇的机会；森林里的持枪警卫也没有抢劫他，我真庆幸他总是能平安归来。连我们一伙国际友人去西哈努克市海边过千禧年除夕时，他也是带着吊床，晚上就挂在我和Heidi合住的小木屋前阳台上睡觉，我们要他进来屋里挂着睡，他也不肯。

十多年前Lindsay放弃英国数学博士的学业，背起旅行包，开始到世界各地自助旅行，这么多年来，他没有过任何全职工作，打过各式零工，也当过新药物实验的白老鼠，专心旅行。Lindsay也去过中国大陆，印象最深的就是人们早晨刷牙时水在喉咙里打转发出的洪亮漱口声，他很喜欢学给我听，总逗得我哈哈大笑，也爱学中国大陆那一套叫我“小刘”。去了这么多地方，Lindsay最喜欢柬埔寨，一待就是六七年。

我唯一一次周日时在游乐场街摊吃炒面，就是和Lindsay一道，边吃边看柬埔寨人玩飞天椅。我们从没见过转得如此快速猛烈的飞天椅，速度之惊人早已超过安全标准，可是那些小孩大人玩得不亦乐乎。连Lindsay这样经历过各式旅途惊险的人都说，“好可怕！”

Lindsay是我在柬埔寨时最好的朋友之一，因为没有固定收入，总是自称吝啬，但实际上是个非常温暖的人。对世俗成功没有任何兴趣的他，知道我在美国修读博士，老摆出英国绅士那一套，说要向我脱帽致敬，然后再问我何时才能看破人生。因为远在苏格兰的年老父母身体状况不佳，去年（2004年）Lindsay离开了柬埔寨回到英国。他告诉我，准备去台湾赚钱，好再去柬埔寨。在台湾靠英文赚钱，好像是不少西方人在亚洲旅行讨生活的手段之一。

回到我们在王宫前散步的国王生日那天。离开王宫前的草坪，我们走到洞里萨河边，人山人海，大家都想看送水节时参加比赛的龙舟队练习，还等着国王出来说话。我们挤了好久，终于在为国王搭建的金碧辉煌的凉亭旁的河堤上找到地方坐下。我们来得晚，竟然可以挤到这么好的位置，说起来真是不好意思，因为早已坐定的当地人，看到我这个老外瞧啊望的在找位子，就主动挪啊挤的，居然空出了可以塞下我们一行四人的位子。在柬埔寨当老外，常令我受宠若惊。

我第一次和这么多柬埔寨人挤在一起，虽然我穿得很邋遢，戴着高棉巾，也晒黑了，但是每个当地人都知道我是外国人，我想是我的眼镜泄了底。好多小孩尾随着我要钱，只是他们看起来一点也不像游民，是一些看到外国人就学样讨钱的小滑头。不过，柬埔寨的小孩再滑头也没有越南丐帮似的小鬼难缠，我在胡志明市碰到的小孩，讨钱时理所当然，大胆厚颜，那油条本事真是让我不得不为那个国家未来一代的心态忧虑。

国王生日那天放了一小时的烟火。烟火不是便宜的东西，可是柬埔寨过重要节日一定燃放烟火。11月21日至23日的送水节甚至连放三天，每个政府部门还会出资造一座船舫争奇斗艳。柬埔寨这个国家虽然很穷，过起节来却一点也不含糊。这是一个宗教与传统高于肚皮的地方，可以饿死很多人，但可不能让国王与神明寒酸。

送水节可说是柬埔寨最重要的节庆活动，据说源于3世纪至6世纪扶南王朝的海军战役，吴哥古城的巴阳庙有不少壁画石雕描绘扶南王朝海军参战的史诗。送水节就是模仿古老王国的海军征战，上百艘来自各省、县、机关团体的龙船，聚集在洞里萨河进行一公里的划船比赛，每艘船都载有超过三十名的壮汉在艳阳下奋力竞标。比赛一连三天，最后一天是决赛日，也是最热闹的日子，整个金边进入嘉年华的气氛，据称每年都有上百万的民众从柬埔寨各地涌入金边河岸。除了

龙舟比赛，传统音乐会、小吃摊贩，还有各式各样的工艺品，更增添了送水节的欢乐气氛。

节庆活动虽有趣，毕竟是日常生活中的难得惊喜。说实在的，如果对卡拉OK没兴趣的话，在柬埔寨的休闲娱乐可真是有限，文化活动更别提了。最好的书店，就是五星级大饭店金边金宝殿酒店（Cambodiana Hotel）和洲际酒店的小书店。那里卖些外文书，好的书籍多以法文为主，也有几本关于柬埔寨历史的英文研究书籍，但数量非常有限，还不如到曼谷的“亚洲书店”（Asia Books）去找。

逛市场也许是最寻常的休闲娱乐了。金边最大的市场是“中央市场”（Phsar Thmei），清真寺般的圆顶建筑，占地颇大，从高处看中央市场的圆顶外部，非常壮观漂亮。中央市场是金边市区内主要的货物交易地，可用摩肩擦踵、人声鼎沸来形容这里热闹的景况。

中央市场周边的店家也形成主要商圈，这一带的越南咖啡豆也是外国人的最爱。越南咖啡豆喝起来极顺口，不酸不苦不涩，加上那种特殊的越南咖啡冲泡器——就一个铝制或钢制的小罐架在玻璃杯上，咖啡粉压在罐底，倒入热水，比Espresso还要浓缩的咖啡就从罐底的小洞滴漏至杯内，滴完一杯至少要好几分钟，一般店家还会替客人加入炼乳。因为冲泡咖啡的方式简单有趣，很多人会因好奇而来上一杯，原本不嗜咖啡的人也很容易上瘾。我就是如此，去柬埔寨后没多久，每天早上刷牙前，就把越南咖啡冲泡器放在玻璃杯上，等梳洗完毕，咖啡也冲好了，全然不费力也不用电。

其实柬埔寨北部也产咖啡豆，只是量少，所以很多人并不知道。以前我常到隐没在民宅区内的一座咖啡磨坊去买柬埔寨咖啡豆，等待老板秤装分包咖啡豆时，我都会和她三四岁的小孙女玩捉迷藏，顺便好玩地和她学说柬埔寨儿童的话。不知是心理作用还是怎的，总觉得柬埔寨咖啡豆比越南咖啡豆还要好喝。和柬埔寨咖啡味道一样好的咖啡豆，我只在西非小岛圣多美和普林西比（Sao Tome and Principe）买

过。我想这些咖啡之所以如此好喝，除了咖啡豆本身的品质好以外，还因为直接在原产地购买，当然就更新鲜美味了。

外国人最爱去的市场，则是Phsar Toul Tum Poung，又称“苏联市场”（Russia Market）。它分不同区，有食品区、小吃区、古物区、衣服布料区、银器饰品区、音乐电影电子区、五金杂货区、文具用品区、瓷器区、美容区，还有几家可兑换世界各国货币的地下钱庄摊位，应有尽有。连大麻也称斤论两卖，一美元一大袋，品质当然不好，因为不是让人哈拉两口快乐似神仙用的，大麻传统上是柬埔寨入汤的药材，我喝过柬埔寨友人母亲烹煮的大麻炖鸡汤，真的很香，喝了也不会有副作用。柬埔寨山区的农夫开始把大麻当作经济作物来种，始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由泰国商人引进的。90年代起，柬埔寨政府经常有扫荡行动，但大麻的贩卖仍是到处可见，很多旅居柬埔寨的西方人，在家里抽大麻就和抽烟一样容易、频繁。

苏联市场也有卖盗版书籍，但质量与内容都不好。不过，盗版自世界各地的音乐和电影光盘可真不错，因为柬埔寨的外籍人士来自五湖四海，因此什么音乐都有，我在那里听了不少台湾市场上难寻的音乐。来自世界执法先进国家的外籍人士，都是这里盗版光盘的爱好者，一张最多四美元，谁在自己的国家可以享受如此自由的市场？每个人都买得不亦乐乎，还可以试听。在柬埔寨，要买正版音乐、电影还不知到哪儿找哩！我每个周末都会去苏联市场买菜，逛光盘店，常常在店里遇到朋友，互相交换好听好看的光盘资讯。

偶尔我也顺便去看看有无新到的马来西亚棉布，可以做那种大花大绿的衣裙和农夫裤。柬埔寨女人喜欢穿尼龙质地的衣裙，看起来华亮，不褪色也不会皱，但在热带地区穿这种衣服，实在是不透气。所以我常到市场寻找棉布，都是马来西亚进口的，没有柬埔寨自制的棉布。柬埔寨产丝，但丝质的衣服在大太阳下穿起来也挺难受的。不过，柬埔寨丝做成的高棉巾真是美丽实用，为了配合外国人的胃口，

什么颜色都有，最普通的高棉巾一条不到一美元即可买到，那是我这辈子买过最物美价廉又轻便不占行李空间的民俗礼物。

传统的高棉巾是红色或绿色掺白色条纹的长方巾，是乡间柬埔寨人的日常必备用品。别小看一条轻薄不大的高棉巾，可以包头、遮阳、防雨，擦汗、洗脸、洗澡，打赤膊的男人常用来当围裙，还可绑成包巾裹物提着走。我在柬埔寨时，高棉巾也成了我每日不可或缺的用品，脖子上一定挂了条高棉巾才出门。

苏联市场的古物区也很好玩，但真正的好古董已不多了。听说1991年开放之初，市场上到处可见古物，而且价格便宜，早早就被识货的老外买走了。不过，至今还是会看到不少有趣的器物，尤其是与华人有关的老东西，在那遥远的时代，似乎走到哪都有吸食鸦片的华人。我买过不少有的没的的小东西，像是牛骨做成的牛铃、传统的竹片乐器、越南来的画有蜻蜓的瓷器、传统珠宝盒和古式鼻烟壶等。

金边博物馆前也有几间“文物古董店”，所谓的文物古董都是些翻刻的石雕像、木雕和油画，大多俗气粗糙，但若有耐心慢慢挑选，还是可能找到便宜也不错的东西。我最喜欢大大的国王头像和仙女全身雕像，但我知道不可能把他们扛回台湾的，所以只好用五美元买了一个不记得名字的古王朝王后头像，二十几公分高的黑色仿石雕，还算精致。我买回来那天，一直赞叹王后美丽的侧面，大大的嘴抿着微笑，线条神秘又迷人。我太入神了，不知不觉一直研究着头像；我的室友看不过去，说我一直摸着王后头像嘴里还喃喃自语的模样，看起来“很猥亵”，真是笑死人了。我想我又被柬埔寨古人的神秘微笑迷住了，就像我曾被吴哥古城巴阳庙的国王微笑迷住了一般。

不知是否受到法国殖民的影响，柬埔寨与越南的油画家真不少，不过还是越南的好油画多一些。一般而言，越南的艺术文物、工艺品质都较柬埔寨好。金边有几家小画廊，常从越南进口油画。我偶尔会和法国友人Vincent去逛逛，Vincent很爱买油画，有时会请我陪他去挑

选。我在越南北部的河内和中部的顺化（Hue）见到的油画，画风和金边常见的越南进口油画颇为类似。我也从顺化挑了七八幅小油画回来，有几幅我留在柬埔寨了，其他的带回台湾，但不知被我塞到哪里去了。

我在柬埔寨的时候，金边没有电影院。唯一看大荧幕好电影的机会，就是法国文化中心定期的电影放映。这中心是许多老外，尤其是法国人的最爱，是金边文化活动最多、品质也最佳的场所。为了维持法国文化在前殖民地的影响力，也为了给海外法国人提供“优质”文化生活，法国政府可真是花费了不少经费、心力筹办各式文化活动。

我曾受邀在法国文化中心演讲，介绍台湾原住民的历史文化。为了让听众对台湾及台湾原住民有清楚的视觉印象，两位金边大学法语系的女学生，以及当时正来柬埔寨玩的台湾朋友小马，协助我制作了台湾地图，那个拿过世界新闻摄影冠军、旅居纽约马格南图片社（Magnum Photos）的朋友张乾琦也够义气，在台湾帮我翻拍了不少介绍原住民文物的幻灯片。就这样，1999年3月，我对着一群法国人、柬埔寨人、台商、同事，还有我不知道何许人也的听众，介绍了台湾原住民的历史。

听众的回应很有意思，但有一个问题我至今也不知如何回答。一名在柬埔寨、越南北边山区做研究的法国语言学者问我，台湾原住民和中南半岛北部的Hmong人有何关系，他觉得部分台湾原住民的文物器具和Hmong人的很像。我知道Hmong人被认为和中国大陆的苗族是同一支，但可没听说过苗族或Hmong人与台湾原住民有地缘或文化关系，这两类人分属不同语系哩！只是，没研究过我也不敢斩钉截铁地说不。

在法国文化中心看过的活动，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名柬埔寨老乐师Prach Chhoun的表演，七八十岁的老乐师，像台湾的陈达一样，弹着琵琶一般的柬埔寨传统乐器，自编自唱逗趣古调，独挑大梁一个

半小时。我虽然完全听不懂，但居然可以适时大笑，可见老乐师的感染力超越语言限制。文化中心的负责人很自豪能够从外省请到老乐师来表演，推崇老乐师为柬埔寨的国宝。表演结束时全场听众掌声如雷。

还有一位柬埔寨传统皮影傀儡艺师也令我印象深刻。他叫Mann Kosal，1982年由西北方的马德旺省来到金边，先在艺术学院学了七年传统戏剧，后来才学做皮影傀儡，没有老师传授，完全自学，傀儡角色的设计一手包办。Kosal现在应该四十五岁了，我不知道他是否还继续制作皮影傀儡。我去拜访他时是2000年2月，他告诉我，因连续六年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雕刻皮影傀儡，当时年仅四十岁的他视力已模糊不清，医生要他最多再做一年就不要做了。



摄影丨刘绍华

Kosal的技艺之好，国际有名。他主要是在一个叫Sovanna Phum Association的组织里做他的皮影傀儡，一名yi利潇洒的年轻法国女子

负责把Kosal的作品销到国外，来自法国的订单最多，澳洲、意大利、日本、中国、泰国、比利时、英国、美国、德国也有客户。偶尔，也会有皮影戏在Kosal的组织上演，来看表演的大多是西方观光客。

Sovanna Phum曾于2004年底，受邀在台北华山创意园区户外剧场的“亚洲相遇”（Asia meets Asia）活动中，和菲律宾的棉兰老岛与台湾原住民一起表演。

我非常喜欢Kosal的作品，活灵活现的，可以很传统，也可以很现代，甚至两者兼具也不减艺术性。我拜访Kosal之前的六年间，他制作的皮影傀儡已超过千件，从上市场买牛皮、清理牛皮，到设计雕刻完工，全是他一手包办。我在Kosal身上看到了传统精工匠那种屏气凝神的专注，那近乎神圣的特质令我为之动容。

我拜托Kosal，他要开始处理牛皮制作新傀儡时，请通知我，我很想见识整个过程。其实，我更想见识的，是Kosal那种维系工匠技艺的精神。

2月19日元宵节那天，一大早Kosal打电话来，说他刚从南边郊区的Kandal市场买了张牛皮回来，准备动工了，问我要不要过去看看。早晨七点，听到Kosal这样说，顾不得疯狂周末夜残留的疲倦，我要他一定等我，马上到。

匆匆梳洗完毕，拿起相机，就搭着摩托计程车赶到了Kosal那。他脸上始终挂着含蓄腼腆的微笑，没有中年男性的世故，不多说，便开始工作。Kosal从一个大袋子里拿出一团血淋淋的牛皮，还挂着一条长长的牛尾巴哩！十四公斤重，摊开成两公尺左右的不规则形状，成堆的苍蝇立刻黏在牛皮上不走了，但Kosal完全不受苍蝇与牛皮的腥膻味影响，用棉绳缝住牛皮边缘，再将绳拉扯紧绷，钉在预备好的木条框上。

然后Kosal开始刮除牛皮上的血肉。这个过程看似简单，其实可不容易，力道太小，残余的血肉很难清除干净，但若施力过大，皮破了可就没戏唱了。Kosal仔细清除牛皮，边刮边把除下的血肉丢给一旁的小狗吃。那只灰色短毛的小狗还真是工匠养的，我没见过能够这么耐心等待的狗。



摄影丨刘绍华

Kosal专注地清理着牛皮，偶尔抬起头来笑一笑。虽然不过早上九点，太阳还没到顶，但也够热了，我特地背来FM2手动相机，但照相的动机其实远低于只想蹲着呆望的心情。当初拜访Kosal并提出拍照要求时，并没有撰写任何文章的打算，我也老实告诉Kosal是我个人的好奇与兴趣。Kosal全然不介意，并说只要我有兴趣，他很乐意跟我说话。

Kosal是这样一个没什么心眼、手艺又好的工匠，我问他会不会让他的孩子继承衣钵，他说他们还小，一个男孩六岁，一个女孩五岁，

等他们长大了，他的眼睛也不行了。未来，很难说。

牛皮上的血肉清理得差不多后，再用水管冲水清洗，原来血肉模糊的牛皮变成近乎纯白色，此时，太阳也近正午了。Kosal和他的学生Bin合力抬起木框，移到一旁晒太阳。Kosal有不少学生，但只有Bin跟着学习雕刻皮影傀儡，其他的都是学皮影戏的操作。

工作暂且告一段落，Kosal引我到戏棚外的凉椅上喝茶，我们开始闲话家常，看他设计的各式皮影人物。我看上一个征战国王的造型，拜托Kosal制作一个。半个多月后，我带着那大小刚好可塞进一个大皮箱的皮影傀儡回到台湾。台湾气候潮湿，皮影傀儡有些沾上霉菌，但皮质很厚，所以至今形状仍坚固完整，每次看到这个皮影，就想到Kosal的专注。

我常在想，到底维系工匠的那种专注精神从何而来?

我在乡村合作学校的办公室警卫Mr. Kith，年约六十，小学校长退休，颇有儒者气质。有一天，我们在教室里举办卫生教育的教员训练工作坊，请金边大学公共卫生硕士Keo Sitho来讲解。Sitho把复杂的卫生知识讲得生动有趣，我也听得津津有味。但窗外突然一声重物落地的巨响，让我不得不分心，我太过好奇，偷溜出教室跑到窗外一看，一颗椰子由好几公尺高的树上坠落地面，椰壳也没破，但椰蒂已呈现干燥纤维状。

Mr. Kith在远处纳凉，我跑过去指给他看那颗椰子。我想的是还好没人正巧经过椰子树下，不然还得了！Mr. Kith却走进办公室，搬出一颗硕大的棕色椰子，靠近顶端处切了道弧状，制成了一个盖子。老校长打开盖子，里面现出一盅瓷器茶壶。原来，椰子壳厚厚的纤维内部成了最好的保温层。Mr. Kith巧手拣选合宜的掉落椰子，做成兼具艺术与实用性的茶壶保温器。为了美观起见，Mr. Kith在椰子外壳上涂了一层亮光漆，还可防水。

几个星期后，我刚到达学校时，Mr. Kith就捧了个椰子茶壶保温器给我。这是他特地做了送我的，我欢喜极了。这么大的一个椰子保温器，也被我带回了台湾。虽然从没用过，也很占空间，但我始终舍不得把Mr. Kith特制的保温器扔弃。

是生活，我想。在Kosal和Mr. Kith身上，我充分感受到了那种视工艺为生活一部分、认真活着的态度。也是这种专注，让吴哥窟的石雕经历世纪风雨、人祸摧残仍精巧动人。虽然柬埔寨的长年战乱造成的文化浩劫，让许多精工艺术消失或失去传承，但我相信，找得回的。王宫、博物馆里只剩残破的古王朝历史文明，连保存都得仰赖外人。但幅员辽阔的柬埔寨，礼失求诸野，是有可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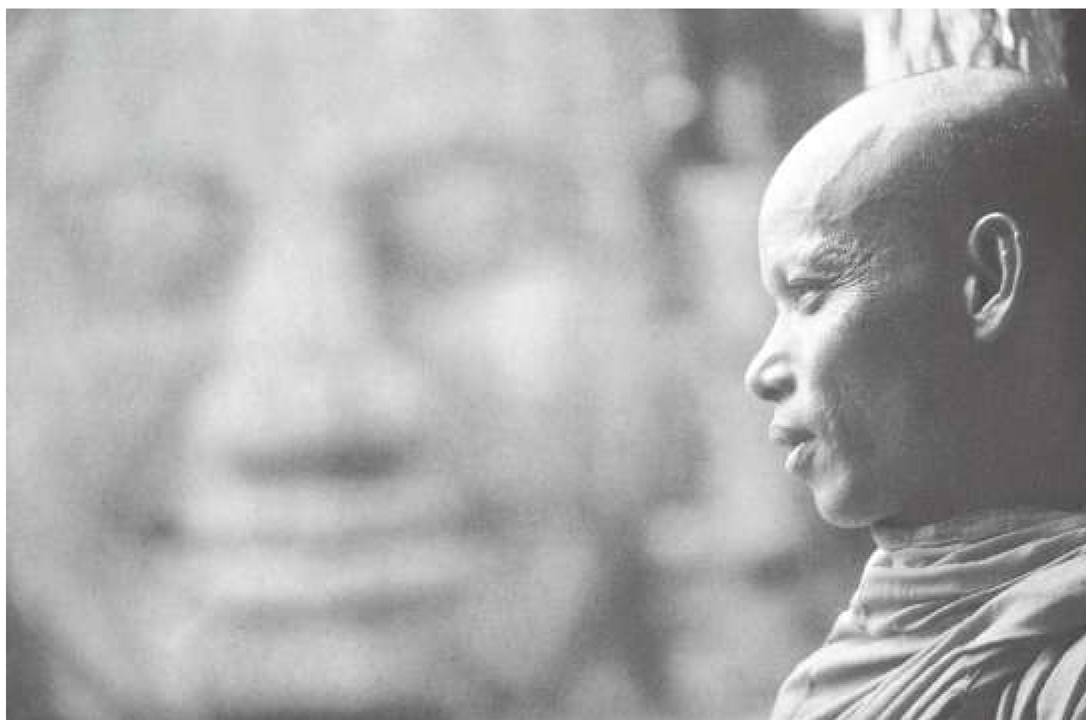
明天

小乘佛教的兴盛使得这个国家寺院林立，

长年的内乱让寺院成为人们暂时安身立命的喘息空间。

随着恐怖统治与流离失所的时代结束，

开放发展的磁力却让年少的和尚们浮动，想要放下传统奔向经济前途。



摄影丨黄丁盛

现代化的发展标准到底是什么？每个人都可能有不同的意见。不过，我相信，大多数的人，都会把经济发展指数列为主要标准。“拼经济”可能是全球化中最普遍的心态，而效率与勤奋，常是经济是否拼得

起来的关键。渗入东南亚及中国大陆的台商，最常断言一个地方欠缺经济前景的说法便是：“人太懒、太笨，工作没效率。”也许吧，当这些标准成为既定的“现代化”准则时，游戏规则已决定了比赛结果，还有什么好玩的呢?

我想看的却不只是经济因素。许多令人宁愿不要所谓现代发展的非经济理由，让我思索经济发展的迷思。

我又想把柬埔寨和越南这两个世敌、同为前法国殖民地、差不多同时对外开放的“发展中”国家对照一下，说说我对发展的感想。

我曾异想天开和朋友完成两千公里的越南长征。两千公里？！台湾南北也不过三百多公里。光是路程就花了四十六小时，累到我抵达河内时腰酸背痛，还发了一天烧。

最大的收获是，我再也不敢梦想坐火车穿越西伯利亚了。

首先，我们从金边坐巴士到越南边境，花了五小时。下车徒步走过一段无国家管辖的边界，对于来自岛屿的我，真是稀奇的经验。我在那无人管的边境上驻足停留了一会儿。光秃秃的黄土地上，只见过关的旅客来回行走跨越那没有实际界线却是权威无限的边境。咫尺真的有如天涯。大热天的，在没有任何树荫遮棚的黄土地上走了近十分钟，抵达越南关口，只有一名长得酷帅的越南官员，着红星卡其制服，检查二十多名旅客的行李及证件。那越南官员动作缓慢而仔细；每一位旅客的行李都被全部翻出一一检验，神色不愠不怒，甚至可说是面无表情。

不过二十几人的陆地通关手续就花了两小时。

终于过关了，走出海关又是别有洞天，绿树凉荫下有许多饮食凉水摊贩，还有接驳的小巴士等着客人出关上车。终于找到了接驳我们

这一行人的小客车，报上要下车的地点后，我们就坐在后座。一路上的自然风景和柬埔寨很相似，只是人很不同，尤其是老农顶上的越南斗笠，说明了我们所在之处，路旁的屋子和中国南方的民宅颇类似。

又颠簸了两小时才到胡志明市。从金边到胡志明市，这一段路约两百公里。

后来又从胡志明市坐火车到顺化，花了二十二个小时，再从顺化坐巴士到河内，又是十七个小时，这一段路约一千八百公里。

整个旅程在车上的时间，一共是四十六个小时。有两个晚上是在车上过的。一个晚上坐的是椅背成九十度的长途汽车。“九十度”不是随便说说的，那椅背可真是笔直，从没坐过这么不考虑人体工学的长途汽车。另一个晚上坐的是最高级的单间卧铺，这种单间卧铺的价码和飞机票差不多，大概只有我们这种好奇求新鲜的观光客才会愿意花高价受罪。

我对越南的火车卧铺可真是印象深刻。没有空调，车窗打不开，卡死了，火车服务员也没办法，就只好这样一路闷到河内。车上的小贩多得不得了，为了清静，我们把车厢门关起来，谁知道，那门是里面锁了，外面却打得开，小贩们管你关门与否，把你的门一拉，轻轻松松就开了，然后向你兜售东西。除了小贩，路过的乘客也像参观动物园似的，随便打开你的门往里望，像开自家门一样随意。我们累得很，却不得片刻清静。我索性拿出旅行随身携带的晒衣绳，在门闩和车厢内的钩子上努力串绳打结，费尽心思，心想闲杂人等总打不开门了吧！正得意时，乘务员却来敲门查票，狼狈极了。

走了这么一段长征路，首要的感想是，一个国家要发展经济，公路系统要发达才行。越南是个长条形的国家，南北货运交通主要靠公路，当然也有火车及航空。和柬埔寨比起来，越南的主要南北纵贯公路真是笔直顺畅，一路上货车频繁往来。而柬埔寨，靠着先前的法国

和苏联以及晚近的日本等国金援或贷款建造起来的公路，以金边为中心，往四周省份辐射散开，至今仍是坑坑洼洼、有一段没一段的。在柬埔寨乡间烂泥路或石子路上开车，有时会突然来上一段令人惊艳的水泥路，没头没脑的，就那十几公尺的好路，说明了预算限制和阶级优势，政府预算被贪污到只剩杯水车薪可以修整十公尺的道路。也有富人自扫门前雪，把家门前的路修得美美的，当成自家钢筋水泥洋房的延伸。

不过几年光景，光是从公路系统的差异来看，柬埔寨和越南两国的落差愈来愈明显，功利态度更是有别。在越南买东西，小贩紧紧地监视你，促促地向你推销。而柬埔寨的小贩，多是等着你慢慢挑拣，不买也没有愠色。

越南人有那种华人缝里插针式的赚钱精神，柬埔寨人（华裔多属例外）却没有。这种精神，让越南如此快速地把柬埔寨甩到后头，也让台商受不了柬埔寨人的“笨、懒散、没效率”，而转移至“勤奋、肯赚钱、学习力强”的越南，更让越南的各大城市都积极往前看，而处于声音失控的状态。

越南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喇叭。不管大车小车，前面有没有车，喇叭都像是接触不良似的随时随地乱按，完全没有目的、无意识似的乱按，连没有喇叭的三轮车夫也凑上一脚摇铃助阵。

赶路赶个没停的越南啊！

不论好歹，越南的一切都那么有动力与积极而行。相形之下，柬埔寨就像是仍处于前工业状态的社会，即使也想发展，人心的转变速度仍是跟不上。

也许就是效率低，才与传统的距离靠得稍近，让柬埔寨保留了优美舞动的文字。而向效率看齐的越南，自17世纪殖民时代，就因便利

之故，放弃了以华文为主的传统文字，改为罗马拼音，成为一个没有自己文字的国家。

柬埔寨未向法国殖民者主张的“现代化”和“效率”低头。1943年，法国殖民长官乔治·戈蒂埃（Georges Gautier）宣布他想用罗马拼音取代柬埔寨文字的四十七个字母。柬埔寨文源于中世纪的印度梵文，对于外国人而言太难学，被认为有碍行政公文效率。戈蒂埃及其支持者认为，改变柬埔寨的文字是一种“现代化”的做法，认为柬埔寨人想要保留古文的心态太落伍。

但是，柬埔寨人，尤其是佛教僧侣，将法国人的“改革”建议视为对传统的破坏。佛教僧侣在柬埔寨传统社会中扮演教育者的角色，许多古文经典只有僧侣才看得懂，所以在社会中地位颇高的僧侣，对法国人的建议反对最烈。只是，法国人仍于1944年至1945年间，积极鼓吹文字改革的想法。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人进攻中南半岛，法国殖民政府才被迫放下此议案。日本人解除法国政府武力后不久，西哈努克国王便应日本政府要求宣布“独立”，将国家由法文名称Cambodge改为柬文发音的Kampuchea。独立后的柬埔寨政府最先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取消文字改革命令。

当时以僧侣为主的柬埔寨知识分子，视法国的命令为对柬埔寨文明的打击。僧侣在这个小乘佛教国家，不只扮演了宗教传承的角色，更是维系传统文化及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

绝大多数的柬埔寨村庄，包括金边在内，都有各式寺院佛塔，大小不一，乡村学校通常都和寺院建在一起。第一次拜访乡下住家附近寺院里的老和尚时，曾担心我的女众身份不宜登堂入室，结果和尚们不仅没有禁忌，反而争先恐后地和我聊天。老和尚说，近几十年来出家的和尚多是孤儿，“红色高棉”时期的孤儿尤其多。

柬埔寨是东南亚艾滋病感染率最高的国家，目前有些国际组织也和寺院合作，收容照护艾滋病人或其孤儿。寺院就像是柬埔寨乡村的孤儿院，收容这个国家的受难灵魂。

在寺院里，我好像看见了柬埔寨的历史缩影。

小乘佛教的兴盛使得这个国家寺院林立，长年的内乱让寺院成为人们暂时安身立命的喘息空间。随着恐怖统治与流离失所的时代结束，开放发展的磁力却让年少的和尚们浮动，想要放下传统奔向经济前途。我见到的年轻和尚，都没什么心思读经，倒是成天想着学英文、电脑。他们告诉我，如果有机会学习别的技能，就不要当和尚了。

就像是这个国家曾经历过的宗教变迁一样，现在新一批的国际传教士也相继涌入柬埔寨，传递新的信仰——基督教、技术、经济与发展。连和尚们都想站上这股新教浪潮。

只是，经济发展的浪潮由金边起伏到农村后，也只剩下泡沫幻影。柬埔寨乡间的发展，仍停留在也许是台湾20世纪50年代的光景，农村生活困难，雨季又常逢大水，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动到金边寻求生路。年轻有机会者，可能到工厂打工，没门路者只能流落街头乞讨或偷窃。不少农村少女被人口贩子拐骗到金边甚至泰国卖春。我在湄公河畔的Neak Leoung工作，就眼睁睁地看着经常拜访的家庭中两个青春期少女“不见了”，家人说是经人介绍到金边的成衣厂打工，但从此无下落，我回到金边时也找不到那家所谓的成衣厂。经常处理被诱拐贩卖孩童的“小水滴”孤儿院的Fabio说，“到金边成衣厂打工”是人口贩子到农村拐卖少女的惯常伎俩。其实很多父母都知道实情，只是，弃贫从娼，是贫穷乡村迈向经济发展时常见的“慢性病”。

不可避免地，柬埔寨继续往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上走去，但在其跌跌撞撞的现代化历程中，我却看见一些美丽的“非现代性”残

存。

回忆起来，越南之旅至今仍历历在目，去时我坐了四十六小时的陆上工具；回程时，我是一路搭飞机由河内经胡志明市转金边，马不停蹄。我简直是逃出越南的。在越南时，我极度想念柬埔寨人的单纯。

虽然五年过去了，我相信柬埔寨的变化不大，只是，经济发展的驱动力，终究会将柬埔寨转型成什么样，我不知道。只好祈祷，小乘佛教的精义仍会留在当地人的血液中，存其优美的温厚及随意。

失梦园

柬埔寨曾经是许多台商的梦土。但不到十年，

多数的台湾投资者不仅铩羽而归，

甚至有的全身覆没、魂杳异乡。柬埔寨成了名副其实的“失梦园”。



摄影丨黄丁盛

柬埔寨曾经是许多台商的梦土，一个战后国重建的大饼，的确充满商机。1992年时，第一批近百名台商进入这个五倍大于台湾的国家寻找机会，1995年台湾喊出“南向政策”并在柬埔寨设立“代表处”后，近四千名台商涌入柬埔寨，但2000年以后，只剩四百名台商留在这

里。不到十年，多数的台湾投资者不仅铩羽而归，甚至有的全身覆没、魂杳异乡。柬埔寨成了名副其实的“失梦园”。

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对在东南亚、中南美洲和中国大陆的台商有些偏见，总认为其中充斥不少投机分子，甚至劳力剥削者。在柬埔寨的岁月里，我算是近距离地看到了一些台商的负面形象，但同时也进入他们的生活脉络中，体会了无所不在的无奈。商人到底在寻找什么？“利益”当然是直接的答案，但是冒险或赌徒精神也是不可或缺的吧！也许两者兼具是我在柬埔寨见到的多数台商的共有特质。他们个性四海，人在江湖。

在柬埔寨投资，一道道的关卡，让许多中小资本的台商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逐步走向泥淖。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语言，真正的Lost in Translation。

很多台商初到柬埔寨便觉亲切，因为有许多华裔柬人会说华语，不少台商就像认老乡似的不辨善恶，很快便对其推心置腹，结果是上了贼船。有些被骗的台商，甚至反过来伙同当地华人欺骗更晚到的台商。被自己人诓骗的滋味，最令台商愤愤和不齿。在柬埔寨的台商没几个会说当地语言的，会说流利英语的也是凤毛麟角，当然只能依赖华裔柬人的翻译，这是台商自我条件的先天不良。

语言的问题也影响台商找“女朋友”。台商的圈子关系密切，大家互相依靠帮忙，他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的默契，就是不问初来乍到者过去在台湾是做什么的。很多台商是形单影只地来到柬埔寨，又非常害怕安全问题，很少出门旅游，无聊的生活加上“小姐”便宜，包个固定“女朋友”的台商真不少。

最受青睐的就是会说一些华语的年轻华裔越籍女子。在柬埔寨讨生活的越南女子多如过江之鲫，其中许多从事特殊工作，在KTV或舞厅打工，涉及性交易。越南是社会主义国家，明令禁娼，很多越南女

子便到柬埔寨找机会，在不过十条大街的金边，娼妓馆或从事性交易的场所比比皆是。台商经营的舞厅和KTV，清一色用的是越南女子，真正的“物美价廉”。1998年时，带出场过夜费只要五十美元，有的还每三个月替小姐做一次艾滋病筛检，“品质保证”。曾有一位台商说，如果柬埔寨真的扫荡色情行业，这个国家的观光业就会垮掉。该名台商的说法或许夸张，但也许反映出众多台商（以及日本、新加坡和香港地区的男人）到柬埔寨，尤其是金边观光旅游的真正目的。

亚洲商人在柬埔寨可谓独树一帜，遗憾的是，一般不是正面形象。在柬埔寨的商人除了台商，其余以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为多，而这里的西方人多是政府相关机构人士、国际组织工作人员和旅游晃荡的年轻人。由于商业势力远大于西方国家，所以亚洲商人变成“多金”的代名词，在通过海关时，常会被想要贪污的海关私下索取五至二十美元的“腐败税”。不给，海关就刁难。其实，即使不给钱任由海关刁难，最后也不会有事，但亚洲商人总是不谈原则，惯于花钱了事，造成恶性循环，永无宁日。每次经过柬埔寨海关，即使我拿的是组织工作签证，我的台湾旅行证件也总是让海关以为可以对我施以同样伎俩。不过我都佯装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结果常常就是让我最后通关，以表达他们的不爽。

亚洲商人和西方人在金边的生活方式非常不同。比方说，在金边街上，常见西方外籍人士搭乘摩托计程车，但很难见到亚洲商人搭乘摩托计程车；周末晚上，一般的酒吧里也很少见到亚洲商人。多金形象的亚洲商人常成为抢劫绑架的对象。这让许多亚洲商人非常忧虑金边的安全问题，不敢随便暴露在大街上。

台商可能更没有安全感。1997年时，“台湾驻柬埔寨代表处”被柬埔寨的强人首相洪森关闭了，台商都有“国际孤儿”的喟叹，当然得自求多福，小心为上。

为求自保，许多台商在柬埔寨定居的第一件事便是自备手枪。经常可见台商腋下夹着一个二十多公分长的黑色皮包，里面装的就有手枪。当年，两百美元便可买到一支手枪，AK-47的冲锋枪更便宜，七十美元便可到手。

除了持枪自卫外，台商多会雇请保镖开车或看门，有些非常没有安全感的台商，甚至会在四轮传动车后座配两名保镖，前座再加一名，武装保护。我刚到柬埔寨时，几名台商请吃饭，晚上回去时，那些台商要他们的带枪保镖坐在我们车上，然后他们自己再开一辆车尾随我们护送到家。我第一次和持枪人士同坐一辆车时，心情真是复杂。

这些保镖多来自军队，由将军向台商出租部下，长官自己抽八成佣金。虽然匪夷所思，却也符合现实。柬埔寨政府经常发不出薪水给军队，没钱养家糊口的军人可能一晃眼就成了抢劫的盗匪，所以台商雇用军人当保镖，也算有诡异隐微的正面意义吧。有些台商戏称：“我们是在替柬埔寨政府养兵。”

只是，买手枪、雇保镖反而可能有树大招风的效应。这无疑是向抢匪和绑匪表明自己是有钱人，所以有些台商采取其他对策，保持低调。

有位经营得道的台商说，“世上没有完美的投资环境”，认为许多台商夸大了柬埔寨的缺点，不会从全球经济的外部观点来看柬埔寨投资环境的转变，只会一味怪罪柬埔寨的环境不好。和台商经常批评柬埔寨“缺乏专业素养”一样，不少在柬台商自己就不是专业的投资者，或者惯于用走后门的途径解决问题。

许多台商在柬埔寨付出不少没有收据的成本。曾有一名鞋厂的台商告诉我，运输一集装箱的鞋子，不论是进口或出口，都要给海关三

千至四千美元的回扣。这样下来，一船十个集装箱的损失就高达三万美元。

1995年以前柬埔寨采取非常开放的政策，“开放”得让许多投机分子以为这里真是投资天堂。例如木材业，1995年以前可以随意砍伐；1995年4月以后，柬埔寨政府开始管制伐林；在联合国的强力施压之下，1998年后柬埔寨更是禁止砍伐山林。由于许多伐林业都是台商投资的，损失当然惨重。曾有一名台商因此损失了上千万美元，后来只好转移至中国大陆。

根据柬埔寨发展部1999年的统计，台湾是柬埔寨第二大投资方，投注了一亿四千万美元，台湾方面也持同样说法。但是，不少台商对此嗤之以鼻，他们说：“如果我们真的这么大，为何还是没什么力量？”

曾经在柬埔寨做生意颇有成就的陈启礼也说过：“这说法根本是个笑话。”

我曾向一家与美国合资、生意规模庞大且有制度的台商请教此问题，得到的答案是，这项统计只包含了私人投资，但许多国家和地区对柬埔寨的投资是以援助的名义进行，并不会列在商业项目上。我想这是合理的解释，很多国家和地区（包括日本及西方国家）的援助，确实包含了许多产业培植投资。

台湾是夜郎自大吗？还是不自量力？或许两者皆是。

我犹记得一些在柬台商的草莽行径，他们凭着一股冲劲来柬埔寨打天下，甚至会基于爱“国”心而大肆举办庆祝晚会，和金边的中国领事馆对着干，却没想到事后“外交部”只辅助一千五百美元，徒呼奈何。

五湖四海却不见得意气风发，尽管人数锐减，台商为何还是要去柬埔寨投资？也许就如一名台商好友说的，柬埔寨有的是台湾没有的自由和无拘无束，来这里，不只是想赚钱，也是一场冒险。

告别高脚屋

在柬埔寨的日子里，我常在想，

我到底懂得什么知识能够应用于发展工作?

在后来的岁月中，我有缘去尼泊尔与非洲，观察了其他的国际组织和台湾自己的援助计划后，我理解到，技术与知识当然很重要，但心态可能更是关键。



摄影丨黄丁盛

“昨晚你离开后，中心发生了一件事。”Fabio以那一贯的正义凛然口吻突然说起话来。正在与通心粉交战的我不得不放下刀叉，抬头不解地望着不过二十出头光景却已脑袋微秃的Fabio。“什么事呢？”“Jantha半夜被社工发现在吸吮Suka的阴茎。”听得我有些愕

然，“Jantha几岁？”“七岁。”“Suka呢？”“五岁。”我们对看了一眼后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Jantha又是一个受过性虐待的孩子吧！”就这样，我完全不记得那天我点的通心粉是什么口味的了。

但是我清楚地记得这段对话，我和Fabio难得在金边约了一起吃饭，就在优美的洞里萨河畔餐厅。

Fabio是我在Neak Leoung非正式教育工作站的邻居、“小水滴”孤儿院的工作人员，来自瑞士意大利语区的他，是个对生命非常严肃，严肃得我不知能否对他开玩笑的年轻人。他和他的主要工作伙伴Christopher两人一个样，以社会运动的批判态度在柬埔寨工作，不加入国际组织注册成立的协会，不愿浪费时间在外籍人士的社交活动上，把绝大多数的时间奉献在解决儿童被拐卖的问题上。有时我不禁想，是不是瑞士那种优渥平静的环境，让他们看到亚洲的不合理时，这么容易激动。

“小水滴”也是少数我知道在金边没有办公室的国际组织，Fabio他们长待乡间，即使去金边也是住在旅馆。在金边的外国人，尤其是西方人，大多练就了在冷气别墅内研读发展中国家悲惨处境的本事，然后将之转化成科学理性的报告；其政府再以精密的外交考量与预算衡量，佐以人道救援的“香料”，将一道道的发展美食端上发展中国家政府的餐桌，而悲惨的人民就在餐桌下等着大官朵颐饱食后扔下的渣滓。这当然不是国际组织援外的目的，不幸的是，却是经常发生的结果。这是Christopher最痛恨的事。

我有幸成为他们的邻居，也许该说，如果不是因为他们的协助，我可能也不会进入Neak Leoung开办非正式教育。

我离开巴萨河畔的高脚屋后，便积极寻找下一个计划点，我希望找一个没有国际教育组织进入的地方。因缘际会，我认识了Christopher，他邀我到Neak Leoung看一看，认为也许我们可以合作，

我办教育，他们做技术训练，补对方之不足，扩大对地方的协助。我被他说动了，一起从金边坐着开往越南的野鸡小巴士，颠簸了三个小时，终于渡过湄公河，来到Neak Leoung，当晚我就住在他们的高脚屋。经过一番调查，我选定了这里作为非正式教育计划的地点，在我觅到合适的办公室兼住处前，我一直住在他们那，和Fabio及后来的义工Richard成为室友，三人轮流煮饭，第一天意大利餐、第二天法国餐、第三天中餐，这样轮流下去。

就是住在Fabio那里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与中心孤儿院有了不少接触，也经常随同他们的“大转弯”（U Turn）活动，到附近湄公河畔的港口村绕一圈，巡一巡看村里的孩童为何最近没来中心上课，或是年轻妇女为何不再参加缝纫课程。

我也是在那里见到Jantha，那个被发现半夜吸吮小小男孩阴茎的小男孩。Jantha平常看起来没什么异状，只是有点安静，我跟他讲话，他从来不回应，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听懂。

中心的小孩，绝大多数都是曾被诱拐贩卖的流浪儿童，心理问题较多。但我没见过像妹妹这样经历过苦难后还如此开朗的小女孩。

妹妹是在柬埔寨西北部与泰国交界的边境地带一个叫Sysophon的地方被发现的流浪儿童，被Christopher带回了“小水滴”在当地的孤儿院，1998年时才五岁，是一个长得聪明可爱的小女孩。

我非常喜欢妹妹。她和大部分的柬埔寨小女孩不一样，不害羞，爱讲话，常大笑，不爱穿裙子，个性像小男孩，和其他小男孩一起玩时，会做出拳打脚踢的开玩笑动作。我每次看到她抬腿踢其他小男生时，就想笑，好像看到自己小时候，也许是这个原因，我特别喜欢妹妹。

我对妹妹喜欢到甚至想要收养她。

我第一次想要对一个生命负责。在妹妹身上，我看到一种对生命乐观伶俐甚至有些无谓的态度。妹妹常常赖床，爬不起来吃早饭，当大家都守规矩时，妹妹总是吊儿郎当样，但是她又很有礼貌，让人很难对她生气。我常在早上去“小水滴”拜访时，在门口遇见睡眼惺忪的妹妹，手里抓着两百元柬币（约合台币二元），说是老师要她去买早餐吃。

妹妹好像对什么事都来去安之似的，小小年纪就一副很有胆识的样子，不愧是“混过江湖”的孩子。我很希望妹妹能得到好的教育，这么聪明自在的孩子，不栽培真是可惜。

只是，因为和台湾一样的歧视，柬埔寨政府不准单身女子收养小孩。中心的小孩，运气好一些的，都是被欧洲夫妇收养去了。

没能再见到妹妹，是我离开第二个高脚屋的遗憾之一。

我的第二个高脚屋，是在Neak Leoung的湄公河畔，院里有一株很大的波罗蜜树，两颗硕大的波罗蜜果实就吊在树干上，唾手可得。波罗蜜长得有些像那味道重得成为唯一被禁止带上飞机的水果——榴莲，但外壳上的刺不似榴莲又尖又长。我脑海里总印着一幅影像，瘦弱的Emma着连身长裙蹲在地上，右手拿着一把大菜刀，左手用一条毛巾抓住榴莲刺手的外壳，奋力剁开榴莲的模样，她对榴莲的迷恋真是令我叹为观止。我也有自己的迷恋。在柬埔寨外出时，我从不买水喝，渴了就在路边现选现开一颗椰子，享受清香的椰子汁和椰果肉，不过七台币左右。东南亚的水果令人惊异，长相奇特，但真是滋味鲜美。

除了那株大波罗蜜树，我更记得第一天爬上高脚屋时的诧异。房东已把房子清空大半，准备让我们搬入，我走进最靠阳台的一个房间时，里头空空的，只有一根柱子上凸出一方小台，上面摆了一个罐子，我好奇地凑上前仔细看，突然看到一个相片中的人在瞪着我，吓

得我倒退了一步。虽然我知道房东可能是华人后裔，因为中年的她法文流利，显然受过良好教育，但怎么也想不到她会把骨灰坛放在房里。我后来才知道那是她先生的骨灰，真是鹣鲽情深哪！但怎么在房客来看房子时也不将之移开呀！我后来每回进那间房时，总是不由自主地瞄一瞄那空空的一方小台，心里怪怪的。我当然不肯住在那间房，拜托一个男助理去睡那。

搞定了办公室及住处，我也开始在金边招募新计划的工作助理。在几十份履历表中，只挑出了十名应征者面试，我把最引起我注意的Thyda放在了第一个。和Thyda一谈完后，我就知道其实不用再面谈其他人了。

Thyda是那种粗壮有力的柬埔寨女子，笑起来真够豪爽的，在国际组织的工作经验丰富，以前老板的介绍信也夸奖她，后来和她一起工作时，我真的相信，如果不是因为要结束计划，以前的老板应该不会让她离开。我告诉Thyda，我能提供的薪水比她以前的少，但如果可能，我希望她能尽量主导新计划，因为我们终究会离开柬埔寨，我希望未来她能接手这计划。对像Thyda这样能干又有毅力的女子，我提出的条件吸引了她，她要的就是挑战与做自己的主人。

就这样，我和Thyda两人开始了Neak Leoung附近村庄的家户访查工作，我们还在邻村征募了另一名英文说得不好但能力不错的老师，我们三人一起设计问卷，一起访问，一起和地方教育单位和学校协商，终于确定了我们的计划。我们计划对七岁到十四岁之间的女童，实施识字教育与健康教育；对十五至四十岁的年轻妇女开展健康教育课程，时间选在她们不用做家务的晚上。为了鼓励女童来参加，我们还陆续拜访了女童的父母，希望获得支持。

但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合作得这么愉快的两名伙伴，后来被接手工作的团员解聘了，理由是Thyda教唆当地教师罢工以要求加薪。我在台湾听到此消息时，真是错愕得无言以对。当初我是用偏低的薪资聘

到Thyda的，我们一起工作的时间里，她从没抱怨过。我实在很难想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更没有想过，我离开第二间高脚屋时，留下了两个这么大的遗憾，我留下了妹妹，也留下了第二个叫Thyda的助理。她们现在如何，我无从得知了。

我还记得，离开前几天的某个黄昏，我和Thyda在湄公河畔并肩坐着看夕阳，Thyda流泪告诉我，她很喜欢我这个朋友，在她与外国人工作这么多年的经验里，她觉得和我一起做事最快乐，不论她是否对我过于友好，我真是感激她这样说，我还记得她坐在我右边，抓着我的右臂，依依不舍的表情。

在柬埔寨的日子里，我常在想，我到底懂得什么知识能够应用于发展工作？在后来的岁月中，我有缘去尼泊尔与非洲，观察了其他的国际组织和台湾自己的援助计划后，我理解到，技术与知识当然很重要，但心态可能更是关键。

我想到一位只做了三个月就离开金边工作站的团员临走前说的话。那时台湾刚发生1999年的“九·二一”大地震，我人正在Neak Leoung，没有电视。一个在金边的法国朋友突然打电话来告诉我这消息，我心焦如焚，用时速一百二十公里的车速冲回金边，打电话回台北的家，打电话给在埔里的朋友、在山区的原住民朋友，没一通电话接得通，真是急死人了。办公室的电视又坏了，只好跑到台湾来的李医师的诊所里，坐在诊疗室的椅子上看新闻，看得边叹气边哭。

隔天，那名来柬还不到三个月的台湾团员就说要辞职回家，我说我会守住办公室，让她回去探望，但问她为何要辞职，她回答：“我的朋友说，台湾都这样了，你还在那边干吗？在那里帮什么别人的忙？”

面对这种反应，我真是无言以对。也许就是这种似是而非的逻辑，让台湾的对外援助始终抱持着自我中心的态度。台湾的援外政策是一旦关系恶化便断然中止发展援助计划，完全不考虑对当地的冲击，也不顾及对台湾名声的影响；一些台湾民间组织只对海外华人提供协助，任凭生活在华人圈旁的当地人眼睁睁地看着，两个族群的世界因为援助而越来越远；也有不少英雄主义式的援助，倏忽来去，满足了个人遥远猎奇的慈善想象，却不顾对当地造成的冲击，以及对后来的援助者造成的负面效应，遑论对当地居民提供真正有益的协助。

每个人都有一套自我逻辑，合理化所有的选择与行径。只是，世界之大，也许我们真的该看出去。自己一定是起点，但必是终点吗?

外一篇：一则乡野传奇的日记

我有一个记忆与柬埔寨无关，之前出版《柬埔寨旅人》时也就没收入这则故事。但是，其实这个记忆一直守在我柬埔寨岁月中一个莫名却温暖的角落，静静地看着我，似乎就怕我忘记。十多年过去了，而今我有机会再度回顾柬埔寨对我的生命意义，我终究要把它从那个角落掏出了，1999年9月23日我的柬埔寨日记。

那一晚是中秋节前夕，“九·二一大地震”过后仅两天，我只身独处异乡柬埔寨，心系家乡，亟想透过电话感受和家人团聚的温暖。和台北的哥哥通上电话，未料远端却传来一个突如其来的噩耗，哥哥担心我的反应似地缓缓说着：“大哥过世了，两个星期前和人下了两盘棋，动了气，脑溢血走了。”大概是离家太远，脑里也充满了对台湾大地震轰隆隆的悲伤，乍听这有些荒唐的死讯，我当下没能反应，只说了声：“喔。”几秒钟后才被一拥而上的天灾人祸生离死别痛击到，“哇”一声地哭了出来。

虽然和大哥只见过一次面，但那酷似父亲的身形面容使我难以割舍，还有那一段令我永生难忘的乡野传奇。

早七年前，也就是1992年，我的父亲在台北过世，临终前仍牵挂着回湖南浏阳文家市探亲。当年匆促逃离家乡，自此与只有五个月大，仍在襁褓中的儿子缘悭一面。父亲离世后一年，我为了代父完成心愿，与母亲、叔叔、婶婶联袂返回父亲的老家。

父亲过世半年前，曾接湖南的叔叔来台探望年近九旬的奶奶。叔叔返去时，父亲让他带着花花绿绿的美钞回乡盖新屋，还有大大小小

的礼物馈赠亲友，其中包括一只金戒指，嘱咐叔叔转送给远住东北辽宁的大哥。

当年父亲的家族是文家市最大的地主，自秋收起义起就一路被斗，留在当地的近亲也都成了黑五类。父亲家的老宅在“倒刘”运动中被炸，土地用来建造水库。我看过那座早已没有用处的水库，枯水中露出父亲回忆录中所写的铜墙，似乎如同顽强的记忆一般，坚实而难以摧毁。当年父亲家族遇难，父亲前妻的家族为免女儿受累，将她和婴儿接走，父亲一家人就此分离。只是，人散了，连坐的指控与受罪在那个年代也不会善罢甘休。父亲前妻为求翻身远嫁东北，父亲的孩子也改名换姓。在1987年台湾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以前，父亲都是通过香港的亲戚，辗转费时地与家乡联系。偶尔，父亲前妻的老家亲戚也会辗转传来断断续续的音讯。我还记得小时候我们一家人谨慎低调地翻读着对岸捎来的书信。极薄的纸张，钢笔的墨水，简体的字迹，奶奶的拭泪，还有父亲的沉默。

父亲托叔叔捎去的那只金戒指，包含了对大哥认祖归宗的盼望。可是，叔叔没将戒指寄去东北，父亲生前未见愿望达成，大哥也失去了和亲生父亲重逢的机会。

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能见到大哥。

从长沙机场出关时，我还没有找到叔叔前，远远就看到一个酷似父亲的中年男子，眼睛定定地往机场里瞧。我们一行被认出后，不消叔叔介绍，我便对那男子说：“你是大哥吧！”兄妹俩就这样在熙攘拥挤的人潮中，有些腼腆有些倘促地相认了。

上了一辆小面包车，大哥坐前头，我坐后头。刚失去父亲未久的我，愣愣地望着前座男子的后脑勺，心里恍惚地想着：“怎么会这么像呢？”大哥像是鼓起勇气似地突然转头对我说：“‘我父亲’过世的事我后来知道，我不知道‘我父亲’想我啊！”

看着这个中年男子幽幽地说着“我父亲”，我更恍惚了，甚至有些妒忌起来。他们两人只有五个月的缘分，之后越洋阻隔，大哥在成长过程中甚至不知父亲的存在，但是为什么呢？他们竟如此相像，不论外貌、体型、神色、说话的口吻、微抑的嘴角，连握着我的手的大哥手指都和父亲如出一辙。而我们在台几兄妹和父亲生活了二十几年，却不及大哥与父亲的神似，连母亲都承认他们简直是一个模子翻出来的。真的是那块土地上长出来的人哪，不同的乡土味。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兄妹俩几乎形影不离。大哥急切地想从我口中探询父亲的生活，我则依旧恍惚地透过大哥的身形怀念父亲。一天，为了宴客乡亲，必须远赴县城买油，从穷乡僻壤的父亲老家到浏阳县城坐车要三个小时，我和大哥清晨四五点便打着电筒搭第一班公交车去了。

乡间的清晨黑压压的，除了眼前小电筒照出的模糊光圈，我什么也看不清，就这样盲目地上了车。我摸黑往车内走，想找个位子坐下，回头却见大哥拿着电筒在女售票员身上照呀照的，还操着湖南老乡听不懂的北方口音说：“给我看！给我看！”我顿时觉得莫名其妙，甚至有些厌恶起来，觉得大哥真不礼貌，怎么可以拿电筒这样照人，何况还是位女子啊。扯了半天，也不知他们在说啥。大哥终于走过来找我了，一屁股坐下后不待我开口，他便咕哝：“父亲显灵啊！父亲显灵啊！”

我开始有些害怕，眼前这初识的大哥是否有精神问题啊？大哥神情严肃，说了一段令我瞠目结舌的故事。去年一听说父亲过世的消息后，他便披星载月地从辽宁赶赴湖南找叔叔。夜半大哥敲门，叔叔开门时还以为见到父亲的鬼魂。叔侄相见后，叔叔始将父亲交托的金戒指给了大哥。也许是太过伤心有些恍惚，大哥却将戒指弄丢了。没想到一年后带着初见面的妹妹再度搭车时，居然看到售票员的手上戴着父亲送他的金戒指。

大哥一口气说完，我听得离奇且怀疑。天实在暗，电筒的光也实在微弱，车上又挤满着人，就这么一晃眼就认定那是父亲送他的金戒指？我说是否看错了。但是，大哥斩钉截铁一口咬定：“没有错，就是我父亲给我的戒指！”然后又重重地加了一句，“父亲显灵啊！”

就这样，一路上我们兄妹没有多聊，因为大哥的眼睛始终盯着售票员的一举一动，仿佛猎户担心猎物逃脱似的。而我也困惑得不知所以。车子终于摇到了终站，所有乘客都下车了，只剩我和大哥，售票员回头望了一眼后，一溜烟地就窜下了车。大哥跳起来跟了过去，售票员冲进车站的厕所内，大哥就站在门口等，我则悻悻然地跺步看着这出戏。

几分钟后，售票员出来了，用湖南土话恶恶地问大哥：“你想要怎样？”大哥回说：“我想要怎样？那是我的戒指，把它还给我！”谈判场回到了车上，这回轮到司机开场白了，他说：“就算是你的戒指，人家捡到了，你要给多少钱？”

至此，我才确认真的是“父亲显灵啊”！

由于对方狮子大开口，大哥一气，吓唬起他们来了，什么“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宪法明定‘拾金不昧’，我把你告到公安去！”，什么“我妹子从台湾来带着这只金戒指的保单，可以证明你拿了我的戒指”，拉里拉杂的话通通出炉，甚至要我拿出相机“拍照存证”，结果售票员真的怕了，脱下戒指扔在地，一毛钱也没要就跑走了。

拾回戒指的大哥，喜滋滋地戴上遗失了一年的父亲的礼物，口里还是念念有词地说着：“父亲显灵啊！父亲显灵啊！”

在旁看傻了眼的我，从不可置信，到不得不眼见为凭。但仍无法理解，在那一片漆黑的清晨公交车上，仅靠一闪而过的微弱电光，大哥是如何辨认出亦是只有一面之缘的戒指？

事后我还问大哥：“你们的宪法里真的写了拾金不昧啊？”大哥抚弄着手里的金戒指，上面还有我父亲的刻字，眼皮也没抬一下地回说：“没这回事，我吓唬她的。”沉浸在他自己的喜滋滋里。

大哥与父亲的神似，以及这段寻回戒指的往事，都是随着父亲与大哥辞世而永埋我心底的乡野传奇。在异乡柬埔寨，成为我抚慰忧心乡愁与思念亲人的温暖记忆。